



I10

Other related fields



从商业生态的视角分析产业多元化对牧民共同体进化的影响——以伊犁河谷地区为例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HERDSMEN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ECOLOGY—— TAKE THE YIYI RIVER VALLEY AS AN EXAMPLE

唐璐¹, 代婷婷^{2*}, 曹岩岩³

Lu Tang¹, Tingting Dai^{2*}, Yanyan Cao³

^{1,3} 正大管理学院

² 铜仁学院

^{1,3}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² Tongren Unive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399947614@qq.com

摘要

根据研究地区草地自然资源不断耗竭、出现害草侵袭式生长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现象，同时从事传统放牧养殖的牧民净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情况，本文从商业生态学的角度理解牧民转变生产方式的必要性，说明草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的融合以及其利用开发的产业多元化可促进牧民转变生产方式的综合效益的提高。本文首先根据相关理论分析牧民在当前社会的商业系统中提高自身生存能力的必要性，且从商业系统的顾客、市场、产品、过程、组织、风险承担者、政府和社会等物种的关系中分析牧民转变生产方式可促进其共同体在该系统中的竞争力。

关键词： 产业多元化 牧民共同体 商业生态 伊犁河谷地区

Abstract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grassland in the study area are continuously deplet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armful grass growth is severely damaged, and the net income of herders engaged in traditional grazing and breeding is not enough to sustain their livelihoods. This article understands the necessity of herdsmen's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ecology, and explain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rassland resource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ir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herdsmen's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ethods.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herdsmen's ability to improve their survivability in the current business system based on related theorie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ustomers, markets, products, processes, organizations, risk-takers,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the business system. The herders'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ethods can promo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ir communities in the system.

Keywords: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community of herdsmen, business ecology, Yili River Valley



引言

伊犁坐卧于祖国西北边陲，其中伊犁河谷片区不仅有新疆最丰富的降水资源，其拥有的自然资源业让世人为之惊叹，世界少有的野果林、广博而茂密的原始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基因库等，因此素有“塞外江南”之称。其中草场资源更是承担着生态、生产、经济发展、人文传承等多种功能，成为当地百姓尤其是牧民的生存之本。近年该地区出现草场大面积退化、害草侵袭式生长、养殖净收入不断减少等生态环境和经济问题(Ashley, C., Start, D., Slater, R., & Deshingka., 2003; 苏和、塔娜, 2007; 额尔敦布和, 2002; 黄钟苏, 2001)。实施可持续性发展的生产方式转变是当地牧民解决生计的必然趋势。本文将从商业生态学理论的视角分析牧民共同体在新的形式下如何进化适应新的商业系统，全文将围绕草地资源保护和开发的融合、产业的多元化从商业系统的多个物种展开讨论，说明草地资源保护开发的融合与多元化对牧民在新的商业系统中生存的重要性。

1 商业系统中牧民共同体的生产进化的必要性

当前不论从“人地关系紧张”、“生态环境破坏”、“地球资源枯竭”、“贫困”等任一角度分析均表明牧民单纯地依赖草地资源从事单一的畜牧养殖生产活动不具有可持续性(Asgharipour, M. R. et al, 2018; Borrás, S. M. Jr., 2009; 娜日嘎拉, 2019; 苏日嘎其格, 2018; 晓梅, 2017; 海山, 2014; 张效、胡珍丽, 2012; 徐秀英、沈月琴, 1998; 色音, 1998), 本文为探讨牧民如何在当前发展形势中转变生产方式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提出观点，即草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产业需融合发展，作者试探地以商业生态学理论作出解释，表明其可行性。将牧民从事生产的系统看作商业生态系统，也许读者还未适应，但当前的牧民共同体早已具备商业属性，首先他们将产品如牛、羊、马匹等销售到市场中，并且在市场中获取自身需要的货币或物品（如服装、茶叶、摩托车等），因此牧民作为商业生态系统的有机体之一，已经与该系统有着蛛网式复杂的关联，既然如此那么牧民怎样才能在该系统中生存，在商业系统的食物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适应当前的商业生态系统，与其他有机体共同完成进化和蜕变。

很明显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着捕食者、被捕食者、竞争者；一同中的每一种物种都要为生存付出努力和代价，当某种物种生存的过于轻松或艰难，必定是系统的不平衡期，此时的物种必然处在进化阶段(崔思朋, 2017; 敖仁其, 2011; 雷毅, 2001; 陈力, 1998)。如狼和驯鹿的关系，狼以捕食角鹿为生，如果该系统狼较多，则驯鹿的生存压力增加，驯鹿要不断的增强自身的奔跑能力，而狼在追捕猎物的同时需要与同物种狼展开竞争，此时必定导致弱势狼的淘汰或者寻找其他物种作为捕食对象，最终才能实现狼与驯鹿的种群数量平衡，而平衡态以外的状态均属于此起彼伏的进化态。根据这一规律，当前牧民在商业系统中的生存难度增加，牧民需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而提升生存能力的途径不是唯一的，当前就牧民的生产特点，本文提出保护草场生态环境与挖掘草地资源发展的融合、草地资源开发产业的多元化对牧民提升自身生存能力的作用(Dvoryadkina E.B., Animitsa E.G., & Mukhlynina Maria, 2021)。

商业生态系统中众多有机体各行其责，例如生产者负责产品的生产，消费者消耗产品，而消费代谢物成为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或者是生产者通过购买、合作、交换等方式获取生产资料再投入生产(陈静怡, 2021; 孙洁, 2020; 彭璧玉, 2006)。类似的许多子系统循环带动了商业系统的良性发展，如此推导，牧民所在的生产系统也应具有自身的良性循环，回顾牧民生产发展的历史变迁，每一次其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的本系统效益的提升，使得牧民生产系统不断进化，发展到当前半农半牧、农牧融合的基本生产模式，可随着人均草地资源的占有量不断减少、依靠单纯的畜牧养殖，而其他子系统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牧民这一有机体成为系统弱

势群体，它们已经不能在商业系统中得到相应的回报满足生存。其原因是什么，就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牧民的现有的生产方式得到答案。牧民作为生产者利用草场牧草饲养牲畜，然后销售牲畜获得利益满足生存。首先，可以看出牧民的这一生产方式在商业系统中不能形成一个循环，缺少生产资料的投入环节，也就是牧民获取生产资料牧草的途径不是系统消费者的代谢产物，也不是购买、交换获得的生产资料，而是直接通过索取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且未对自然生态环境做出任何维护或投入的行为。其二一个发达的商业生态系统应该与自然生态系统极为相似，即各有机体功能呈现蛛网式互补或重合，保证当系统中的某有机体丧失功能时，整个系统依然可以正常运行，即系统具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这就要求系统某种有机体的功能多样或者能量交换途径多样。由此分析牧民生产有机体的功能仅为提供畜产品供消费者使用，没有生产其他产品或服务的功能，一旦畜产品产量减少、或市场价格波动则牧民的生产系统中会因没有其他生产功能或服务替补，导致牧民有机体获得利益极少出现生存危机，即该商业子系统面临崩溃。根据上述分析，要想增强牧民生产有机体在商业系统中的生存力，首先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生产循环系统，其次生产系统的产品服务功能多样化。根据牧民生产系统的特点，其系统缺乏对生产资料投入环节，即对产生牧草的草地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投入，因此保护草地生态系统成为牧民转变生产方式实施生产的必要环节。草地生态环境系统其本身具有多种功能，如牧民或者依靠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商业系统有机体利用其多种功能生产产品或服务则可以增强草地开发利用系统的抗风险能力，提高该系统的商业生存能力。如草地生态环境具有生物多样性，可以成为旅游、特色植物引种或栽培、药用植物资源的基础（Ahmed, M. T., 2002；薛明路，2016；张立中，2004；包利民、杜富林、原英，2002）。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有机体功能关联越精密展现其功能和价值越多，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各有机体功能关联越复杂其商业价值越高（丁继、于萨日娜，2020；王兴元，2005；郑婷予、汪涛，2020；吴俊宇，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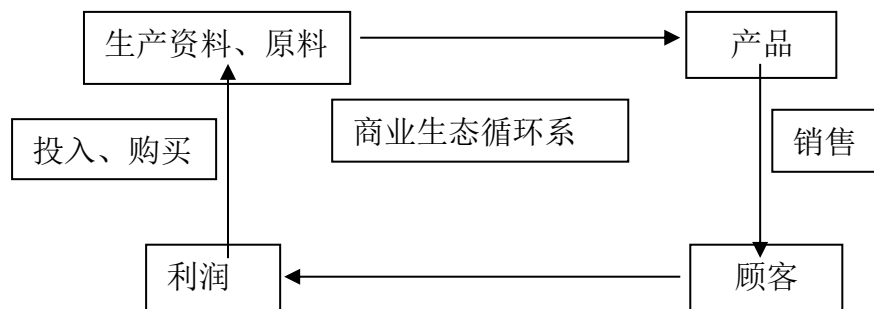


图 1.1:商业系统的可持续性运行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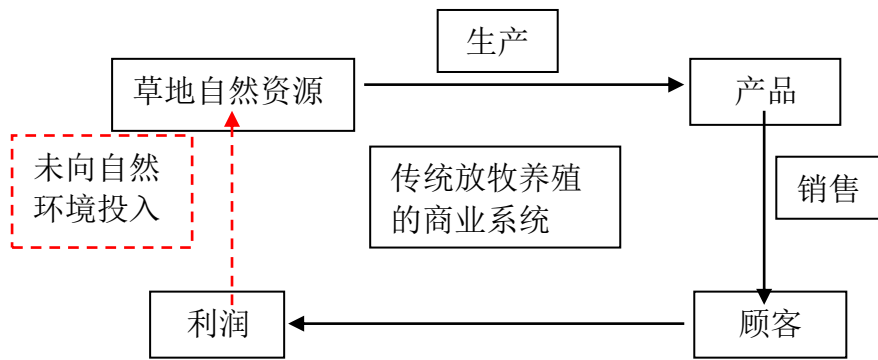


图 1.2: 传统放牧系统的不可持续性机制

2 牧民生产系统中物种关系分析

本文从商业生态学的角度分析牧民生产系统中的顾客、市场、产品、过程、组织、风险承担者、政府和社会等物种的关系，并提出具有草地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的融合、产业多元化性质的新的商业生态环境的构建对牧民有机共同体的进化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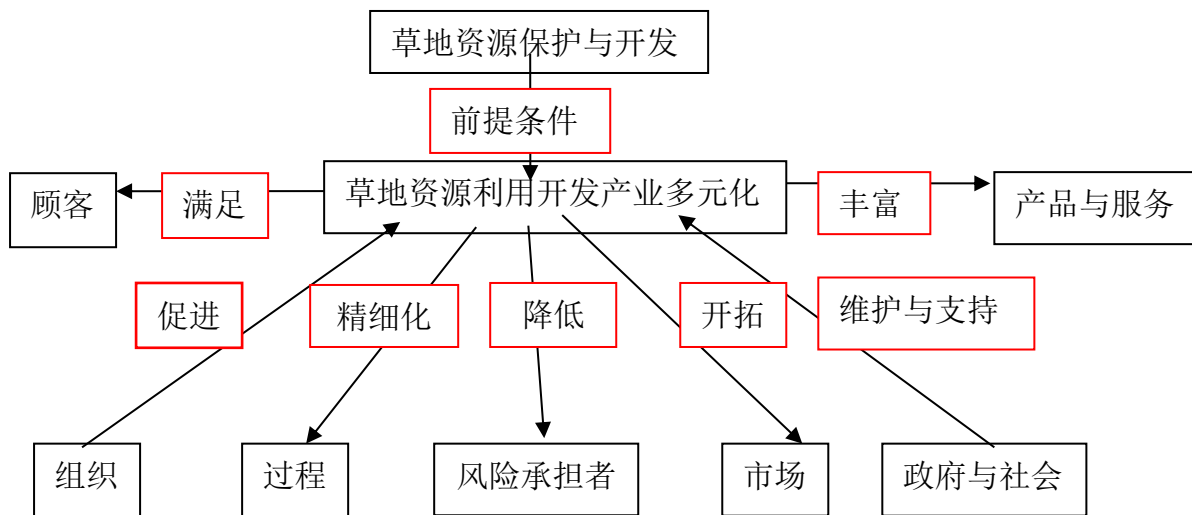


图 2.1: 牧民生产系统中商业物种关系图

2.1 顾客

牧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只能为顾客提供畜产品，即肉、奶、毛皮等。当前的顾客不再满足简单分割后的牛羊肉，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顾客自身作为生态系统的物种，其没有更多的时间成本耗在烹饪这一基本劳动过程，顾客对肉质品的消费方式随之发生变化，顾客更需要已经分割的牛羊肉卷、串、熏肉等半成品，或者是各种熟食、休闲食品等。在当前商业系统中，顾客的需求发生根本转变，顾客对吃、穿、住、行提出的更高更独特的需求，从这一角度去思考牧民共同体的进化方向，则变得轻松、简单，只要迎合顾客的新需求，满足顾客个性化的消费要求，便能找到牧民共同体生存方法，即对产品产地精细化、多样化要求，那么牧民有机体必须加入到这一生产过程。顾客可能不再仅对草原食品有兴趣，他们还会欣赏草原风景、体验草原文化，那么构建满足顾客这类需求的商业子系统将为牧民提供另一生计途径；同样如



今顾客的高品质生活需要更有效的药品、保健品、饮食等匹配，草地生态系统是否具有潜力满足顾客这类需要呢？如今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对上述的回答是肯定的。由此表明顾客的需求的变化为牧民共同体的生产进化提供了机遇，且商业生态的生存要点是能否为顾客作出新贡献，牧民如能利用本系统的草地资源生产出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提升草地资源的利用价值或附加值，甚至挖掘其潜在价值，牧民共同体将在构建的商业新系统中得以生存。

2.2 市场

根据当前市场的前景，伊犁河谷地区牧民共同体对草地资源的利用途径单一，商品化程度低，因此挤占市场能力弱，同时表明其地域资源特色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如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系列占领了当地的高端市场，消费者逢年过节送礼选择的是旗下的特仑苏、纯甄、冠益乳等品牌。而本地大量牛奶只能以散装廉价的形式供给当地居民。牧民共同体如能依靠当地优质的自然资源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优化其利用方式，提升商品附加值，促进共同体在商业生态系统中竞争力，是牧民共同体发展自身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看到随着当前全球各种自然资源的日益耗竭，原料成本的不断攀升，拥有资源的主体将具市场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对资源开发产业的多元化有助于开拓市场，是抢占市场的关键。

2.3 产品

以伊犁的巴口香食品有限公司为例，其生产的牛肉干深受当地百姓喜爱，该企业自 2000 年成立以来，已稳定发展近 20 年，被评为伊犁州国家级重点扶贫企业、肉食品加工骨干企业、重点扶贫龙头企业等称号，这些是值得称赞的，且公司的理念是“科技创新、做大做强”。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该企业依然仅主打牛肉干产品，其市场份额很容易被占领，据作者了解本地的新疆艾尼大叔食品有限公司加入了草原文化元素主打生产草原风味牛肉系列和功能滋补牛肉系列，衍生的有 20 余种单品。如果说产品是吸引顾客的关键，则牧民群体拥有的资源具有开发多种产品的潜力。因此围绕草地资源开发利用产业的多元化需打破传统行业界线，实现产业融合，产业组合为市场生产多种产品提供可能性。如中国卫龙休闲食品企业生产的系列休闲食品涉及面制品、豆制品、素食类、肉制品类等，其中肉质品可以将牛肉制成牛肉丝，开发牛板筋等制品。因此产品的不断创新和更新是抢占市场的前提，当然这不否定经典的存在，经典产品也是在不断的推崇出新中产生。

2.4 过程

从自然原材料的生产到最后阶段附加值最高的产品销售给顾客，不再是牧民仅需将牲畜养大找个买主就可以完成，而是需要一个或几个组织经过系列生产流程，如采购、种植、养殖、加工、检验、设计、策划、销售等，且涉及各生产阶段人员管理工作，牧民在商业系统中的生产过程不再是某一个体可以完成，需要牧民形成非家庭组织的共同体去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作者认为过程是牧民共同体在商业系统中进化最耗时、最困难的阶段，是进化中的定速步骤，过程需要牧民的思想观念、教育背景不断改变并去适应融入参与到商业系统的生产过程。值得庆幸的是牧民新生代职业选择已经逐渐向非畜牧行业转移，这将有利于牧民共同体在商业系统中生存。

2.5 组织

目前与牧民接触最密切的组织是合作社，牧民自愿联和形成的这种组织形式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合作可以解放部分劳动力，实现劳动力的高效产出，同时合作社可以促进牧民经济利益增长，提高其共同体抵抗承担风险的能力。我们也要注意牧民对合作社组织的适应能力，牧民的文化程度、周边人文环境氛围、社会资本量都会影响组织形式的可行性(A, S. W., & B, R. L. A., 2016; Turner, M. D. & Hiernaux, P., 2002; 彭璧玉, 2006; 林瑞基, 2001), 目



前对于牧民共同体在商业系统中的进化现状需要有商业系统氛围的带动，此时当地龙头企业对牧民共同体的接纳和引导显得尤为重要，所以牧民适应组织的初期阶段更需要公益性行为的引导，就像珍惜野生动物在人工驯养后需逐步引导去适应自然环境。且牧民参与的组织可以是多种形式，在组织中承担着不同角色作用。产业的多元化恰好给了牧民共同体这样的机会，如在产业多元化的养殖组织中，牧民可以运用自身技能实现专业化养殖，又如在产业多元化的销售组织中利用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实现直播带货。

2.6 风险承担者

显然牧民传统养殖模式以家庭为单位，故其风险承担者为个体，在商业系统中风险由个体承担会增加其生存难度，就像体型小于麝牛的北极狼必须合作才能捕食猎物，北极狼个体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麝牛攻击。牧民转变生产方式将减少风险承担，例如当市场产品销售价格波动时，由于组织的存在，生产成本的降低、销售团队的经营等，牧民个体风险以转移到组织共同体，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产业多元化则可以纵向的减少牧民的风险，多元化意味着某一产业的风险可以由其他产业收益稀释或淡化，则对于牧民整体效益来说风险远低于传统的单一产业。

2.7 政府和社会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偏远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其中为牧民改善其生活条件，为增加其就业机会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和给予财政支持，从商业系统的视角看待政府的做法，就像一直受到保护的夏威夷岛生态系统，牧民原有的传统文化思想或生计受到保护，一旦有外来物种的侵袭，本地生态系统容易遭受不可恢复性的破坏。因此政府保护牧民的方式致力于授之以渔，适应商业系统的变化方才更有成效，更有利于中国政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结论

商业系统的实时变化使得系统内的所有物种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只有不断适应系统环境，作出改变或者不断进化才能在系统具有竞争力。对于牧民共同体而言，当前适应商业生态系统的键是如何保护和利用草地资源，拥有草地资源是其优势，但如能高效利用其资源则会在商业系统中占据竞争优势，草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多元化则是牧民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其竞争水平的重要途径。

建议

为促进牧民在商业生态系统中健康发展，建议牧民实现生产方式三要素的转变，一是实现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发的融合，比如与对一些退化的天然草地进行播种，修复恢复其自然功能，达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的和谐统一；二是草地资源开发多元化的转变，比如草原旅游观光业、多种食用、药用等功能植物开发等；三是实现技术革新，比如资源开发利用生产技术等。



参考文献

- 敖仁其. (2011). 合作利用牧场制度的理论思考与案例分享.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3 (03), 2-6.
- 包利民、杜富林、原英. (2002). 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S1), 35-36.
- 陈静怡. (2021). O2O 商业生态系统下零售行业多元价值共创实现机理研究——以永辉超市为例.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1), 74-83.
- 陈力. (1998). 可持续发展与内蒙古草原生态建设.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5), 10-11.
- 崔思朋. (2017). 从生态环境史看游牧生产方式及其生态平衡向度.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3), 155-160.
- 丁继、于萨日娜. (2020). 内蒙古农牧交错区农牧系统耦合研究——以科尔沁左翼后旗为例. *畜牧与饲料科学*, (03), 65-70.
- 额尔敦布和. (2002). *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及其防止对策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海山. (2014). *内蒙古牧区人地关系演变及调控问题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黄钟苏. (2001). 信息渠道与竞争衰亡. *中国市场*, (Z1), 37.
- 雷毅. (2001).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林瑞基. (2001). 企业组织发育与死亡的影响因素.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8), 51-55.
- 娜日嘎拉. (2019). *草场不同利用方式下牧区人口迁移原因比较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
- 彭璧玉. (2006). 企业衰亡的生态化过程与制度化过程. *学术研究*, (05), 32-36.
- 色音. (1998). *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苏和、塔娜. (2007). 内蒙古镶黄旗草原生态环境退化原因及可持续发展. *中国草场学报*, 1 (29), 1-2.
- 苏日嘎其其格. (2018). *基于人地关系优化的内蒙古牧区贫困化问题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
- 孙洁. (2020). 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平台战略研究.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 (12), 74-75.
- 王兴元. (2005). 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研究意义. *科技进步与对策*, (2), 175-177.
- 吴俊宇. (2016). 从小众操作系统衰亡看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竞争. *通信世界*, (09), 47-48.
doi:10.13571/j.cnki.cww.2016.09.034.
- 晓梅. (2017). 关于牧区劳动人口流动的研究——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为例.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5 (03), 58-60.
- 徐秀英、沈月琴. (1998). 农村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生态经济*, (5), 11-14.
- 薛明路. (2016). *内蒙古草原生态畜牧业区域政策对牧民增收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张立中. (2004). *中国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 张效、胡珍丽. (2012). 过度竞争对产业衰亡的影响研究. *现代商贸工业*, (01), 35.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2.01.019.



- 郑婷予、汪涛. (2020). 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新能源汽车健康测度研究. *中国软科学*, (11), 182-192.
- Asgharipour, M. R. , Shahgholi, H. , Campbell, D. E. , Khamari, I. , & Ghadiri, A. . (2018). Comparis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bean production systems based on emergy and economic analyse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191(1), 2.1-2.21.
- A, S. W., & B, R. L. A. (2016). Towards a more circular economy: proposing a framework linking 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s.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112, 37-44.
- Ahmed, M. T. (2002).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lution Research*, 9(4), 219-220.
- Ashley, C., Start, D., Slater, R., & Deshingka. (2003). Understanding rural livelihoods in India: diversity, change and exclusion. *ODI Policy Guidance Sheets*. London: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
- Borras, S. M. Jr. (2009). Agrarian change and peasant studies: Changes, continuities and challenges — an int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1), 5-31.
- Brians, Silverman., Jack, A. Nickerson., & John, Freeman. (1997). Profitability, Transactional Alig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 31-52.
- Dvoryadkina, E.B., Animitsa, E.G. & Mukhlynina, Maria. (2021). “Business Ecosystem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s ways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HS Web of Conferences*.
- Turner, M. D., & Hiernaux, P. (2002). The Use of Herders' Accounts to Map Livestock
- Ravenstein, E.G. (1885). *The law of migration*. London:I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s Society.



董事会过度自信、公司监督机制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

OVERCONFIDENC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THE RISK OF STOCK PRICE CRASH

张海芹^{1*}, 徐志坚²

Haiqin Zhang^{1*}, Zhijian Xu²

^{1,2}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研究生院

^{1,2} Chinese Graduate School,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597065469@qq.com

摘要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 以中国 2007-2019 年深沪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了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来源、不同程度、不同种类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 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来源、不同程度对股价崩盘风险有差异影响, 只要董事会具有的心理偏差, 在任一种来源的程度为强时, 其过度自信均会显著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发生, 而两种来源的过度自信程度均弱时, 不但不会加剧还会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发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公司监督机制对于过度自信不同种类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有抑制作用但大部分不显著, 说明公司监督机制的治理作用有限。本文的研究可为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提供制度与监管改革方面的参考。

关键词: 股价崩盘风险 过度自信 优于平均 过度乐观 监督机制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finance, this paper took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from 2007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mpirically test the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sources, degrees and types of board overconfidence on the risk of stock price crash. Results show tha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overconfidence degree of different sources, different have different effect on stock price crash risk, as long a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the psychological deviation, in either the extent of the source of strong, their overconfidence may significantly add to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 occurs, and the overconfidence degree from two sources are the weak, not only won't risk will also contain share prices collapse.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rporate supervision mechanism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 caus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overconfidence, but most of them are not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the corporate supervision mechanism is limited.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establish a perfect capital market in terms of system and regulatory reform.

Keywords: Stock price crash risk, Overconfidence, Better than average, Overoptimism, Supervision mechanism



1. 引言

股价崩盘严重损害股东利益，动摇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甚至造成资源错配，危及实体经济的发展。以往大部分学者从委托代理理论入手研究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认为股价崩盘源于公司内部人长期隐瞒坏消息，当这些坏消息无法继续隐瞒而被释放时，会对股价造成巨大冲击，导致股价大幅下跌。但一些被证明委托代理问题比较低的企业，其股价崩盘风险也非常高，委托代理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后来，有学者用行为金融学理论成功解释了上述“异象”。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以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为基础，以中国 2007-2019 年深沪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索了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来源、不同程度、不同种类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差异影响，并引入公司监督机制，检验监督机制在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提供制度与监管改革方面的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目前，解释股价崩盘风险成因的理论，一个是委托代理的“信息窖藏”理论(Jin & Myers, 2006)，核心思想是，因企业管理者的代理动机所导致的信息窖藏是引发股价崩盘风险的根本原因，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属于理性人预期模型范畴。另一个是行为金融学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Kim 等, 2016)，Kim 等(2016)认为，即便经理人不存在私心，一切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己任，也可能因过度自信导致股价崩盘。他们认为，过度自信的高管通常会高估自己的管理能力，低估项目的潜在风险，当项目最终被证明是失败后，积累的坏消息被集中释放，导致股价崩盘。对于后一个理论大部分研究均是从过度自信的单一维度进行，忽略了不同来源的过度自信在“高估收益”和“低估风险”两个维度的差异。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不同强度及来源的过度自信具有不同特性，Moore 与 Schatz(2017)认为不同来源的过度自信心理，在经济决策的影响上具有较大差异，应区别对待。还有学者认为过度自信心理在管理者作出决策过程中并不全是消极负面的作用。

纵观上述关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虽然已经比较全面，但是从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角度进行分析的仍然相对匮乏，仅有的研究也只是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单一维度，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多维度关注还很少。因此本文将从过度自信多维度角度探讨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方面的研究领域，而且拓展了行为金融学在股价崩盘风险领域的应用。鉴于此，本文探究不同维度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差异影响，提出相应的假设。

2.1 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来源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过度自信从来源上分为：校准偏差、优于平均、控制幻觉、过度乐观。由于优于平均型和过度自信型是基于对内、对外两方面刻画董事会过度自信特征的两个典型分类，尤其在中国特殊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表现得更加突出，因而从不同来源方面，本文仅探讨这两种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与过度乐观型相比，优于平均型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强，因为从来源上看，优于平均比过度乐观型过度自信更为稳定，自信程度更高。从结果上看，优于平均比过度乐观型过度自信产生的行为偏差更大。据此，提出本文 H1:

H1: 董事会过度自信来源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1a: “优于平均”型董事会过度自信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1b: “过度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1c:与“过度乐观”型的董事会过度自信相比,“优于平均”型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大。

2.2 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程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优于平均和过度乐观是从过度自信的横向进行的划分,体现的是过度自信的不同来源。从纵向看,过度自信还可根据程度划分为强、弱过度自信。但是对于这两种不同来源的过度自信,由于来源于“优于平均”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对个人信念的更高承诺,以及可能付出的更大努力,所以与来源于“过度乐观”的董事会强过度自信相比,来源于“优于平均”的强董事会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大,据此,提出本文 H2:

H2:董事会过度自信程度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2a:“优于平均”型董事会强过度自信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2b:“优于平均”型董事会弱过度自信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2c:“过度乐观”型董事会强过度自信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2d:“过度乐观”型董事会弱过度自信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2e:与“过度乐观”型的董事会强过度自信相比,“优于平均”型的董事会强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大。

2.3 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种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本文将过度自信从来源上分:优于平均与过度乐观。从程度上分为强过度自信、弱过度自信。因此,本文将过度自信来源、程度进行组合,形成过度自信不同种类:“强优于强乐观”型、“强优于弱乐观”型、“弱优于强乐观”型、“弱优于弱乐观”型,进一步探讨董事会不同种类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受到自我实现等因素的影响,来源于“优于平均”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对企业未来绩效的影响要强于“过度乐观”的过度自信,因此,与“弱优于且强乐观”型的董事会过度自信相比,“强优于且弱乐观”型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据此,提出本文 H3:

H3:董事会过度自信种类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3a:“强优于强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3b:“强优于弱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3c:“弱优于强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3d:“弱优于弱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H3e:与“弱优于强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相比,“强优于弱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大。

2.4 公司监督机制的调节作用

监督机制是公司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经营决策行为、结果进行有效审核与控制的制度设计。从委托一代理关系来看,董事只是股东的受托人,在董事会内部,有些董事本身是股东,有些则不是股东,后者可能存在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董事既是董事会成员,又是经理班子成员,可能存在与经理合谋损害股东利益问题。因此,为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维护股东的利益,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在董事会中设立独立董事。监事会是公司内部的专职监督机构。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以董事会和总经理为监督对象,一旦发现违反公司章程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可随时要求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纠正。因此,监督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因董事会的过度自信而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据此,提出本文 H4:



H4: 公司监督机制对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抑制作用。

H4a: 监督机制对“强优于强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抑制作用。

H4b: 监督机制对“强优于弱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抑制作用。

H4c: 监督机制对“弱优于强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抑制作用。

H4d: 监督机制对“弱优于弱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抑制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

本文以行为金融学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为研究视角，综合使用了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检验。本文选取 2007-2019 年深沪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持股衡量过度自信的方式需要与上一年度持股数量进行比较，因此样本搜集期间始于 2006 年，并剔除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类受管制公司的样本、2007—2019 年间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ST 和*ST 的公司。经过上述筛选后，共得到总样本 20739 个，包括上市公司 3113 家。

本文各项数据除收益率来自 CSMR，其他数据均来自 WIND。数据分析采用 Stata 15.0 软件进行处理。为排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 的水平进行了缩尾处理。

3.2 变量衡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股价崩盘风险，用股票负收益偏态系数衡量；解释变量为董事会过度自信，分别从过度自信不同来源、不同程度、不同种类进行衡量；调节变量为公司监督机制，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第一大主成分进行衡量；控制变量选取公司规模、月平均超额换手率、账面市值比、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公司信息透明度、年度效应、行业效应。具体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及度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	Nc skew	股票负收益偏态系数，算法参见正文和公式
解释变量	BTA	“优于平均”型过度自信，董事会成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愿增加，当剔除业绩股，红利股等影响后，若董事会当年末持股较上年末增加时，取值 1，否则为 0
	OBA	“过度乐观”型过度自信，董事会前三名薪酬之和与高管前三名薪酬之和的比值，当该比值大于行业中位数时，取 1，否则取 0
	BTAs	强“优于平均”型过度自信，董事会成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在样本年度内自愿增加，且年度收益低于同期市场收益时，该变量取 1，高于同期市场收益时为 0，年度内自愿持股未出现增加时取 0
	BTAw	弱“优于平均”型过度自信，董事会成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在样本年度内自愿增加，且年度收益高于同期市场收益时，该变量取 1，低于同期市场收益时为 0，年度内自愿持股未出现增加时取 0



表 1: 变量定义表 (cont.)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及度量方法
	OBA _s	强“过度乐观”型过度自信，董事会前三名薪酬之和与高管前三名薪酬之和的比值大于等于行业 3/4 分位数时，该变量取 1，小于行业 3/4 分位数且大于等于行业中位数时，该变量为空，小于行业中位数时取 0
	OBA _w	弱“过度乐观”型过度自信，董事会前三名薪酬之和与高管前三名薪酬之和的比值小于行业 3/4 分位数且大于等于行业中位数时，该变量取 1，大于行业 3/4 分位数时，该变量为空，小于行业中位数时取 0
	BsO _s	“强优于弱乐观”型过度自信，当强“优于平均”过度自信为 1 且弱“过度乐观”过度自信为 1 时，该变量取 1；当强“优于平均”过度自信为 0 且弱“过度乐观”过度自信为 0 时，该变量取 0；其他情况为空值
	BsO _w	“弱优于强乐观”型过度自信，当弱“优于平均”过度自信为 1 且强“过度乐观”过度自信为 1 时，该变量取 1；当弱“优于平均”过度自信为 0 且强“过度乐观”过度自信为 0 时，该变量取 0；其他情况为空值
	BwO _s	“强优于强乐观”型过度自信，当强“优于平均”过度自信为 1 且强“过度乐观”过度自信为 1 时，该变量取 1；当强“优于平均”过度自信为 0 且强“过度乐观”过度自信为 0 时，该变量取 0；其他情况为空值
	BwO _w	当弱“优于平均”过度自信为 1 且弱“过度乐观”过度自信为 1 时，该变量取 1；当弱“优于平均”过度自信为 0 且弱“过度乐观”过度自信为 0 时，该变量取 0；其他情况为空值
调节变量	Sup	监督机制，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会议次数 9 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第一大主成分进行衡量
控制变量	Size	公司规模，期末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Turn	月均超额换手率，为当年月均换手率与前一年月均换手率之间的差值
	BM	账面市值比，年末总资产 / 年末总市值
	Roa	资产收益率，净利润 / 总资产平均余额
	Lev	资产负债率，年末总负债 / 总资产
	Da	公司信息透明度，用可操控应计利润作为公司财务信息不透明的代理变量
	Year	年度效应，样本所处的年度，若属于该年度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Ind	行业效应，企业所处的行业，若属于该行业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来源：作者整理

3.3 模型设计

为了考察董事会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对 H1-H3 进行检验：

$$\text{Crash} = \beta_0 + \beta_1 \text{OC} + \beta_2 \text{Control}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Crash 代表股价崩盘风险，由 NCSKEW 来度量。解释变量 OC，是董事会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代表过度自信的不同来源、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即 BAT、OBA、BATs、BATw、OBA_s、OBA_w、BsO_s、BsO_w、BwO_s、BwO_w。Control 代表控制变量集，即公司规模 Size、月平均超额换手率 Turn、账面市值比 BM、资产收益率 Roa、资产负债率 Lev、公司信息透明度 Da、年度效应 Year、行业 Ind。 β_0 为截距项， ε 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考察公司监督机制在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对 H4 进行检验。

$$\text{Crash} = \beta_0 + \beta_1 \text{OC} + \beta_2 \text{OC} * \text{Sup} + \beta_3 \text{Sup} + \beta_4 \text{Control}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Crash 代表股价崩盘风险，由 NCSKEW 来度量。解释变量 OC，是董事会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代表过度自信的不同种类，即强优于强乐观 BsOs、强优于弱乐观 BsOw、弱优于强乐观 BwOs、弱优于弱乐观 BwOw。OC*Sup 为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种类与股价崩盘风险的交互项。Sup 代表公司监督机制。Control 代表控制变量集，即公司规模 Size、月平均超额换手率 Turn、账面市值比 BM、资产收益率 Roa、资产负债率 Lev、公司信息透明度 Da、年度效应 Year、行业 Ind。 β_0 为截距项， ε 为随机误差项。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见表 2。观察表 2 可知，NCSKEW 的平均值为-0.254，标准差为 0.720，最大值为 5.053，最小值为-5.125。这些数据表明不同公司之间的股价崩盘风险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董事会过度自信变量相关数据中可以看出，BAT 的平均值为 0.305，说明有近三分之一的董事会存在“优于平均”型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BATs 的平均值为 0.158，说明在“优于平均”型过度自信董事会中超过一半是强过度自信型。OBA 的平均值为 0.475，说明有 47.5%的董事会存在“过度乐观”型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BsOs、BsOw、BwOs、BwOw 的平均值分别为 0.0975、0.0898、0.0876、0.0860，说明有 8-10%的董事会同时具有“优于平均”和“过度乐观”的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被解释变量:					
Ncskew	20,739	-0.254	0.721	-5.125	5.053
解释变量:					
BAT	20,739	0.305	0.461	0	1
BATs	20,739	0.158	0.364	0	1
BATw	20,739	0.148	0.355	0	1
OBA	20,739	0.475	0.499	0	1
OBAAs	15,590	0.343	0.475	0	1
OBAw	15,544	0.342	0.474	0	1
BsOs	9,692	0.0975	0.297	0	1
BsOw	9,610	0.0898	0.286	0	1
BwOs	9,688	0.0876	0.283	0	1
BwOw	9,671	0.0860	0.280	0	1
DA	20,739	0.0067	0.105	-2.545	2.895
size	20,739	22.25	1.326	15.42	28.64
turn	20,739	620.0	501.7	2.947	5110
PB	20,739	0.399	0.267	-1.347	2.326
ROE	20,739	0.0680	0.719	-54.81	73.37
LEV	20,739	0.456	0.447	0.0071	55.41

来源：作者整理



4.2 相关性分析

从主要变量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3 所示。BATs 的相关系数为 0.0770，BsOs 相关系数为 0.0795，BsOw 相关系数为 0.0632，说明“强优于”、“强优于强乐观”、“强优于弱乐观”型过度自信与公司未来发生股价崩盘风险相关度高。此外，其他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大部分都小于 0.05，因而下文的多元回归分析不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 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Nc skew	BAT	BATs	BATw	OBA	OBAs	OBAw	BsOs	BsOw	BwOs	BwOw	DA	size	turn	PB	ROE	LEV
Nc skew	1																
BAT	0.0538***	1															
BATs	0.0770***	0.6528***	1														
BATw	0.00930*	0.6276***	-0.1800***	1													
OBA	0.00760**	0.0434***	0.0371***	0.0183***	1												
OBAs	0.0232***	0.0552***	0.0407***	0.0300***	0.9990***	1											
OBAw	0.0102	0.0390***	0.0227***	0.0275***	0.9084***	1.0000*	1										
BsOs	0.0795***	0.5825***	1.0000***	-0.1348***	0.9994***	1.0000*	1.0000*	1									
BsOw	0.0632***	0.5666***	1.0000***	-0.1295***	0.9423***	0.6578***	0.6824*	1.0000*	1								
BwOs	0.0010*	0.5497***	-0.1320***	1.0000***	0.9987***	0.6821***	0.6481***	0.6751**	0.5892	1							
BwOw	0.0012	0.5461***	-0.1308***	1.0000***	0.9020***	0.6814***	0.6825***	0.6528***	0.0589	1.0000***	1						
DA	0.0113	0.0681***	0.0358***	0.0516***	0.0134	0.0192	0.011	0.0406***	0.0296***	0.0507***	0.0511***	1					
size	-0.0916***	-0.0274***	-0.0057	-0.0297***	-0.0314***	-0.0405***	-0.0359***	-0.0174	-0.0364***	-0.0395***	-0.0529***	0.0552***	1				
turn	-0.0454***	0.0720***	-0.0408***	0.1354***	0.0350***	0.0299***	0.0479***	-0.0271***	0.0075	0.1389***	0.1362***	-0.0108	-0.3799***	1			
PB	-0.0288***	-0.0851***	0.0713***	-0.1838***	0.0331***	0.0268***	0.0091	0.0887***	0.0421***	-0.1366***	-0.1434***	-0.0327***	0.4583***	-0.3456***	1		
ROE	-0.0009	0.0219***	0.0021	0.0263***	0.0087	0.0093	0.0058	0.0035	0.0037	0.0167	0.0169	0.1014***	0.0327***	-0.0214***	-0.0277***	1	
LEV	-0.0218***	-0.0392***	-0.0374***	-0.0124	-0.0180***	-0.0211***	-0.0181	-0.0295***	-0.0312***	-0.0547***	-0.0561***	-0.0524***	0.1576***	-0.0513***	0.0149**	-0.0237***	1

注: *** 为1%的显著性水平, ** 为5%的显著性水平, * 为10%的显著性水平

来源: 作者整理





4.3 假设检验

4.3.1 主假设效应检验

表 4 是主假设效应检验结果。所有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均为股价崩盘风险，用负收益偏态系数 Ncskew 衡量。模型（1）至（2）检验过度自信不同来源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模型（3）至（6）检验过度自信不同程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模型（7）至（10）检验过度自信不同种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模型（1）至（2）回归结果显示，“优于平均”型过度自信和“过度乐观”型过度自信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两种来源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均会加剧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发生。对比而言，“优于平均”型过度自信的系数 0.0652 且在 1%水平上显著，“过度乐观”型过度自信的系数 0.0167 且在 5%水平上显著，说明与“过度乐观”型的董事会过度自信相比，“优于平均”型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大。与已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假设 H1a、H1b、H1c 得到证实。

模型（3）至（6）的回归结果显示“优于平均”型强过度自信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优于平均”型强过度自信显著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发生，H2a 得到证实。“优于平均”型弱过度自信系数为正，且在 10%水平上显著，H2b 得到证实。“过度乐观”型强过度自信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H2c 得到证实。而“过度乐观”型弱过度自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H2d 得到部分证实。与“过度乐观”型的董事会强过度自信相比，“优于平均”型的董事会强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大，H2e 得到证实。

模型（7）至（10）的回归结果显示“强优于强乐观”型过度自信的系数为 0.1749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H3a 得到验证。“强优于弱乐观”型过度自信的系数为 0.1336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H3b 得到验证；“弱优于强乐观”型过度自信的系数为 0.0860、且在 10%水平上显著，因此 H3c 得到验证。“弱优于弱乐观”型过度自信的系数分别为-0.0039，系数为负，因此 H3d 没有得到验证。与“弱优于强乐观”型的董事会过度自信相比，“强优于弱乐观”型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大，H3e 得到验证。

表 4： 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来源、不同程度、不同种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回归

变量	Ncskew									
	(1)	(2)	(3)	(4)	(5)	(6)	(7)	(8)	(9)	(10)
BAT	0.0652***									
	-0.0108									
OBA		0.0167**								
		-0.0098								
BATs			0.1289***							
			-0.0138							
BATw				0.0357*						
				-0.0145						
OBAAs					0.0324***					
					-0.0119					
OBAw						0.0145				
						-0.0118				
BsOs							0.1749***			
							-0.0247			
BsOw								0.1336***		
								-0.0253		



表 4: 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来源、不同程度、不同种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回归 (cont.)

变量	Ncskew									
	(1)	(2)	(3)	(4)	(5)	(6)	(7)	(8)	(9)	(10)
BwOs									0.0860*	
									-0.0261	
BwOw										-0.0039
										-0.0262
Size	-0.0594***	-0.0580***	-0.0569***	-0.0576***	-0.0591***	-0.0581***	-0.0531***	-0.0558***	-0.0613***	-0.0621***
	-0.0048	-0.0048	-0.0048	-0.0048	-0.0055	-0.0053	-0.0067	-0.0066	-0.0072	-0.0072
Turn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2***	-0.0002***	-0.0001***
	0	0	0	0	0	0	0	0	0	0
PB	0.0429*	0.0313	0.0195	0.027	0.0305	0.0141	-0.0052	-0.0056	0.0185	0.0215
	-0.0241	-0.0241	-0.0241	-0.0244	-0.0279	-0.0277	-0.0356	-0.0354	-0.0359	-0.0361
ROE	-0.0023	-0.0019	-0.0018	-0.0015	-0.0027	-0.0015	-0.003	-0.0027	-0.0022	-0.0019
	-0.0068	-0.0068	-0.0068	-0.0068	-0.0069	-0.0068	-0.007	-0.0069	-0.0069	-0.0069
LEV	0	-0.0011	-0.0002	-0.0016	-0.0047	0.0007	-0.0058	-0.0047	0.0175	0.0169
	-0.0113	-0.0113	-0.0113	-0.0113	-0.0117	-0.0115	-0.0121	-0.0119	-0.0342	-0.0342
DA	0.0566	0.0722	0.057	0.0771	0.0809	0.0667	0.0631	0.0649	0.0607	0.0865
	-0.0473	-0.0472	-0.0471	-0.0472	-0.0536	-0.0545	-0.0709	-0.0704	-0.0631	-0.0674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1546***	1.1238***	1.1016***	1.1260***	1.1183***	1.1241***	0.9457***	1.0386***	1.1692***	1.2105***
	-0.1242	-0.1246	-0.124	-0.1245	-0.1441	-0.1399	-0.1783	-0.1764	-0.1812	-0.1811
Observations	20,739	20,739	20,739	20,739	15,590	15,544	9,692	9,610	9,688	9,671
R-squared	0.06	0.0585	0.0623	0.0585	0.0584	0.0625	0.0673	0.0678	0.0657	0.0676

注: *** 为1%的显著性水平, ** 为5%的显著性水平, * 为10%的显著性水平

来源: 作者整理

4.3.2 调节效应检验

当董事会同时受到两种来源的过度自信影响时,大多数种类的过度自信都会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公司治理机制中良好的监督机制能否降低由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种类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本文通过对多种监督机制进行拟合,并构建不同种类过度自信和监督机制的乘积项,检验监督机制对过度自信和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 5 中的回归结果显示, BsOs*Sup、BsOw *Sup、BwOs *Sup、BwOw *Sup 系数均为负值,说明监督机制对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有抑制作用,但只有 BsOs*Sup 在 5%水平上显著, H4a 得到充分验证,其他都不显著, H4b、H4c、 H4d 未得到证实。总的来说,监督机制只有对“强优于强乐观”型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他都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程度不够强的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较小,不容易被公司治理发现并纠正。



表 5: 公司监督机制在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调节效应

变量	Ncskew			
BsOs	0.1535***			
	-0.0402			
BsOs_Sup	-0.0432**			
	-0.0523			
BsOw		0.1393***		
		-0.0404		
BsOw_Sup		-0.0078		
		-0.0431		
BwOs			0.0530*	
			-0.0378	
BwOs_Sup			-0.0161	
			-0.0437	
BwOw				0.0033
				-0.0388
BwOw_Sup				-0.0421
				-0.0404
Size	-0.0577***	-0.0588***	-0.0636***	-0.0627***
	-0.0092	-0.009	-0.0098	-0.0098
Turn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	0	0	0
PB	-0.0448	-0.0371	-0.0447	-0.0406
	-0.0541	-0.0533	-0.0555	-0.0557
ROE	-0.0043	-0.0041	-0.0044	-0.0044
	-0.007	-0.0069	-0.007	-0.007
LEV	-0.0082	-0.0069	0.0156	0.0085
	-0.0117	-0.0114	-0.0442	-0.044
DA	0.115	0.1359	0.1011	0.0959
	-0.0922	-0.0907	-0.0794	-0.0835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0967***	1.1430***	1.2648***	1.2997***
	-0.2349	-0.2296	-0.239	-0.2384
Observations	3,956	3,938	3,939	3,922
R-squared	0.0931	0.093	0.0881	0.0921

注: *** 为1%的显著性水平, ** 为5%的显著性水平, * 为10%的显著性水平

来源: 作者整理

4.3.3 假设检验结果

本文通过对 2007-2019 年深沪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进行回归检验, 得出以下结果:

(1) 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来源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差异性影响。基于认知心理学中过度自信的不同来源, 结合可以获取的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实证检验了过度自信的“优于平均”来源和“过度乐观”来源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差异性影响。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 来源于“过度乐观”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倾向于乐观估计, 在决策中往往表现为高估收益, 来源于“优于平均”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则会高估个人对行为的掌控力, 表现为低估风险。实证检验发现, 由于“优于



平均”过度自信董事会倾向于对个人能力的高估,在决策过程中会以更大的努力保证决策的实施,因而与“过度乐观”来源的过度自信相比,会对股价崩盘风险造成更为显著的影响。

(2) 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程度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差异性影响。关于过度自信程度的大部分研究均认为,当管理者偏离理性程度较低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获益,但是当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较为严重时,则会降低决策效率,使企业的价值受到损害(Weinberg, 2010; Campbell et al., 2011)。本文结合过度自信的不同来源,检验过度自信强弱程度对股价崩盘风险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来源于“过度乐观”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其程度较低时,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发生不显著;但是对于“优于平均”型的董事会过度自信而言,由于其“决策承诺”的特点,即便是程度较低的心理偏差,也会显著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发生。

(3) 董事会过度自信不同种类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差异性影响。鉴于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可能同时具有多种来源的过度自信,因此,本文结合过度自信强弱差异,进一步研究董事会同时具有两种来源的过度自信心理偏差时,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具体影响。研究表明,当董事会同时具有两个来源的过度自信时,只要有一种来源的过度自信程度为强时,就会对股价崩盘风险有正向影响,而且当董事会在两种来源的过度自信方面的心理偏差程度均较高时,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也最大;但董事会两种来源的过度自信程度都较低时,不但不加剧还会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发生。

(4) 公司监督机制可以抑制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但是抑制作用有限。监督机制对于“强优于强乐观”型过度自信的抑制作用明显且在 5% 水平上显著,但是对“强优于弱乐观”、“弱优于强乐观”、“弱优于弱乐观”型过度自信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的治理作用都不显著。说明,在中国情境下,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还有待发掘。

5. 理论贡献及研究局限性

5.1 理论贡献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将董事会过度自信进行来源区分,按照其对“高估收益”和“低估风险”的不同侧重,研究过度自信不同来源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不同影响,并在不同来源过度自信的基础上,进行程度区分,进一步拓展过度自信强弱研究成果。而且进行了过度自信来源和强度的二维组合,对不同种类过度自信造成的股价崩盘风险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最终对于组合后的不同种类的过度自信,探讨公司监督机制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四点:

(1) 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将董事会过度自信进行来源区分,对过度自信的理论研究进行拓展。认知心理学认为过度自信存在四种来源,分别是校准偏误、过度乐观、控制幻觉和优于平均,不同来源的过度自信,在经济决策中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来源于优于平均的过度自信,会高估个人能力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因而在决策中更多的表现为对风险的低估,而来源于过度乐观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由于其高估对决策的控制能力,会高估项目收益,所以在经济决策中表现为对收益的高估。目前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相关研究中,虽然现有实证研究采用不同的方式衡量过度自信,但是均将其作为“高估收益,低估风险”的一种心理偏差,没有对过度自信进行来源区分,更没有探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差异影响。本文结合目前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主要实证衡量方法,采用经验数据验证了不同来源的董事会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重要的,来源于“优于平均”过度自信,会由于董事会的“决策承诺”以及“承诺升级”的影响,比来源于“过度乐观”的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造成更大的影响。对董事会过度自信进行来源区分,并进一步验证了其差异性效果,是对过度自信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



(2) 在过度自信不同来源的基础上, 进一步进行强弱区分, 完善过度自信程度相关研究成果。现有的关于过度自信程度的研究, 普遍认为适度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可以使企业受益, 但是程度严重的过度自信则会由于其心理对理性状态的严重偏离, 做出损害企业价值的经济决策。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 该结论只适用于来源于“过度乐观”的过度自信, 而来源于“优于平均”的过度自信, 则由于董事会“决策承诺”的影响, 即使是程度较低的过度自信, 也无法单纯地使企业受益。本文的研究还发现, 不论是来源于“优于平均”的过度自信, 还是来源于“过度乐观”的过度自信, 当具有较高的心理偏差时, 都会对股价崩盘风险造成双重影响。研究过度自信程度的不同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对过度自信强度的研究。

(3) 通过对过度自信不同来源和不同程度的组合, 探讨不同种类过度自信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具体影响。基于对过度自信来源和程度的研究, 本文将过度自信在这两个维度上组合, 进一步探索不同种类过度自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当董事会同时具有两种来源的过度自信时, 相较于单一维度会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对于过度自信进行来源和程度的组合, 一方面更符合企业管理的现实情况, 另一方面, 也有益于对过度自信产生的影响进行更加细致的探索, 从而有助于对降低董事会过度自信不良影响的管理机制的探索。

(4) 基于过度自信的不同种类, 探索公司监督机制的调节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下, 关于现有公司治理机制对于管理者心理偏差的治理作用, 研究结论尚未统一。研究发现, 对于具有多种来源的弱过度自信, 公司监督机制的抑制作用不强。对于具有多种来源的强过度自信, 公司监督机制的抑制作用明显。结合行为金融学探讨现有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公司治理的研究成果。

5.2 研究局限性

相较于传统金融理论的研究, 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十分短暂, 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二十年。本文在这一领域相关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心理学的研究结论, 进一步对过度自信进行不同来源和不同程度区分, 研究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问题, 取得了一些初步结论。但总的来看, 这些结论还是探索性的, 研究还存在许多局限。

(1) 过度自信的衡量。如何准确有效的对管理者过度自信进行衡量,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现有文献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及其程度的方法, 没有一种是完美的。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 管理者对期权的持有行为, 往往被认为是过度自信比较有效的衡量方式。但是由于我国缺少相关的期权交易数据, 本文采用董事会持股的自愿增加对来源于“优于平均”的过度自信进行表征, 采用董事会的相对薪酬衡量来源于“过度乐观”的过度自信, 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股票的市场收益以及相对薪酬在总体中所处的分位数, 进行过度自信的强弱区分。但是持股变化和相对薪酬分别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表征过度自信的“优于平均”和“过度乐观”来源, 以及采用的强弱衡量方式是否能够精确的衡量不同来源的过度自信的程度, 这两方面的指标衡量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2) 研究内容的局限。受观测条件及数据获取的限制, 本文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仅限于对“优于平均”型和“过度乐观”型过度自信的影响, 而认知心理学认为过度自信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来源, “校准偏误”和“控制幻觉”, 但是受制于数据获取的限制, 本文没有进一步考察这两种来源过度自信的具体影响。另外, 为方便获取实证数据, 本文选择以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开展实证检验, 然而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 在企业规模, 盈利能力以及公司管理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 因而, 其结论未必适用于非上市企业。此外, 公司治理机制只



探究了监督机制，这主要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没有从外部治理机制或外部治理环境角度探究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 白重恩、刘俏、陆洲、宋敏、张俊喜. (2005).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 (2), 81-91.
- 姜付秀、张敏、陆正飞. (2009). 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 *经济研究*, (1), 131-143.
- 梁上坤. (2015). 管理者过度自信、债务约束与成本粘性. *南开管理评论*, 18 (3), 122-131.
- 刘柏、梁超. (2017). 董事会过度自信与企业国际并购绩效. *经济管理*, (12), 75-90.
- 吕兆德、徐晓薇. (2016). 董事会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兼论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38 (3), 68-78.
- 袁倩. (2018). 股价崩盘风险国内外文献综述. *财会通讯*, (33), 124-128.
- Ahsan, H., & Mostafa, M. H. (2017). Managerial Ability,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17(7), 501-618.
- An, H., & Zhang, T. (2013).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Crash Risk,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1(1), 1-15.
- Bai, C. E., Liu, Q., Lu, J. Z., Song, F. M., & Zhang, J. . (2004).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rket Valu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2(4), 599-616.
- Baldenius, T., Melumad, N., & Meng, X. (2014). Board Composition and CEO Powe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2(1), 53-68.



人工智能带来的我国会计领域的研究综述

A SURVEY OF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IN MY COUNTRY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文佑云

Youyun Wen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893207180@qq.com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and in-depth.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ccounting i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The article sorts out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stand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its research literatur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impact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and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for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trend provides reference suggestion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counting, literature review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2018 年度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人工智能+管理会计”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PROJ10064135511638056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文佑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高级会计师，硕士，广州，510540。

摘要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创新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人工智能与会计的融合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文章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会计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了解其研究文献的基本情况，分析人工智能在会计领域的应用状况、影响及应对策略，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为未来的研究趋势提供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人工智能 会计 文献综述



研究背景

我国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始于 1978 年学者陈步的《人工智能问题的哲学探讨》，随后我国学者围绕着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工智能会计研究起源于最近，Miklos A（1989）在其专著中指出，人工智能可运用于一种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构建从而应用于会计与审计的工作中，德勤（Deloitte Touche Tohmatsu）和 Smacc 两个公司将人工智能在会计中进行应用致使人工智能会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2017 年 3 月，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Deloitte Touche Tohmatsu）宣布将与 Ki-ra System 联手，将人工智能引入会计、税务、审计工作当中，当德勤的财务机器人视频出现在网络上时，引起了会计人员的一片哗然。而 Smacc 公司的人工智能财会软件可以将客户发票转换为机器阅读模式。这也表明在未来，人工智能的浪潮下财会行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笔者以我国目前刊物上所发表的“人工智能与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税务”研究文献为对象，通过设置相应的观测点来观察我国人工智能对会计领域研究点的结构分布与变化情况，进而描述和分析其研究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研究文献总体描述

1. 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基本情况

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篇名”作为“检索项”，以“人工智能”并且“会计”或“审计”或“财务管理”或“税务”作为“检索词”对截止到 2019 年 8 月的“全部期刊”进行高级检索，共搜集了研究文献 390 篇，具体时间分布具体如表 1:

表 1: 研究文献时间分布表

年份	检索项				合计
	“人工智能”并“会计”	“人工智能”并“审计”	“人工智能”并“财务管理”	“人工智能”并“税务”	
1997	1				1
2003			1		1
2005	1				1
2009	1		1		2
2010		1			1
2012		1			1
2016	1	2			3
2017	26	7	6		39
2018	124	15	16	4	159
2019.1-8	153	14	14	1	182
合计	307	40	38	5	390



从上表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对会计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两年，2018 年达到 159 篇，2019 年 1 月到 8 月已达到 180 篇。这主要是因为 2017 年 3 月，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Deloitte Touche Tohmatsu）宣布将与 Ki-ra System 联手，将人工智能引入会计、税务、审计工作当中，随后毕马威也宣布引入 IBM watson 认知技术，这些新闻的发布，迅速引起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在会计领域中的研究。从研究的主题来看，主要研究集中在人工智能与会计方面，该方面的研究已达到 307 篇，也有一定的人工智能对审计、人工智能对财务的研究，分别为 40 篇和 38 篇，人工智能对税务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 5 篇，主要写税务管理应用人工智能的基本情况。

2. 研究文献的发表刊物基本情况

查阅现有的研究文献，只有 15 篇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主要发表在财务与会计、财会通讯、财会月刊、会计之友等刊物，其他 375 篇文章均发表在一般的刊物，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对会计领域方面的研究虽在数量上近几年有了些突破性的进展，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发表的学术刊物缺乏较高的理论性和权威性，在我国会计审计界有没有达到较高认知度。

3. 研究文献的研究主题基本情况

查阅现在的研究文献的研究内容，目前人工智能带来的会计领域¹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四大方面：一是人工智能在会计领域的应用研究；二是人工智能对会计领域的影响研究；三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型研究；四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会计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

研究内容综述及分析

人工智能在会计领域的应用研究

人工智能在我国会计领域的研究始于有学者提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设计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冯静（1999）提出智能财务决策支持系统是传统的财务决策支持系统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决策辅助工具。它能够帮助决策者在复杂环境下进行决策分析，从而确定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梁荣华、史济建（2001）重点论述了实现财务决策支持系统的知识库系统时用到的财务知识表示与财务推理机制，并阐述了财务决策支持系统的结构框架及其实现。徐英杰、顾琳琳、邓金鹏（2005）提出识别虚假会计信息智能化的设想，并初步建立了该系统的模块体系。黄燎隆（2009）认为人工智能可用于专家系统、模式识别、资源规划与配置、智能财务管理信息共享系统、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宣布与 Kira Systems 合作，将人工智能引入会计工作中；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与 IBM 公司合作，将使用沃森认知计算技术开展会计、审计工作；普华永道也推出机器人自动化解决方案；2016 年 7 月，由我国自行研发的“芸豆会计”正式上线试用等等，正式拉开了人工智能在会计工作的应用序幕。综观众多学者的观点，目前，人工智能在会计行业的应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会计核算、审计以及财务管理。会计核算方面，雷力平（2017）认为当前会计行业——会计事务所、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机构等都在广泛使用电算化软件和简单的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日常会计处理——填制凭证、记账、对账、结账等。王加灿、苏阳

¹ 文中的会计领域包含会计、审计、财务、税务等方面。



(2017)发现,目前很多大型企业都在尝试“人工智能+会计大数据”的模式进行会计核算,即将企业海量的会计数据加以智能化运用,符合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跨地区快速使用各分公司会计数据的需求。审计方面,比尔等(2017)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在审计工作中最大的应用就是海量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在大量的数据中找出审计人员需要的关键数据资料。财务管理方面,汪晶(2017)提出了人工智能在高校财务服务中的应用,并阐述了全国高校首个财务智能服务机器人(包括面对面交互智能服务机器人和基于PC、移动端虚拟机器人)的应用设计。张毅猷(2018)认为人工智能在电子发票、会计电子档案的网上报销系统及管理信息系统集成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在会计工作中应用领域还会进一步扩大。陈红(2018)认为人工智能将在经济前景预测、参与会计管理决策和规划、资产评估预测等方面将会应用普遍。孙红喜(2018)认为人工智能推动着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进一步升级,财务共享中心由传统的交易性流程向更高价值的流程转变。

人工智能对会计领域的影响研究

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培育和壮大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产业”,这是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将给社会带来巨大变革。

1. 人工智能对会计工作的直接影响研究

一般而言,按照基本研究规范的要求,作者的研究思想和主要关注点大都体现于文章的关键词、一级标题、二级标题和三级标题之中。因此,笔者查阅了研究文献,通过提取一篇文章的关键词以及一级标题、二级标题和三级标题所含的主题词,了解目前学者们所研究到的人工智能对会计工作带来的直接影响主要有八个方面。(见表2)

表 2: 人工智能对会计工作的直接影响统计表

主要影响	频率
1. 提高会计(审计)工作效率	99
2. 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88
3. 有效预防舞弊行为,降低审计风险	40
4. 节约人力资源成本	26
5.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22
6. 防控会计企业运营风险	7
7. 会计信息安全性没有保障	15
8. 对传统岗位会计人才的需求降低	55

从表2可知:表中1-6项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积极一面,随着人工智能逐渐进入会计、审计、税务等工作之中,其工作效率的提高、会计信息的准确、风险防范及节约人力资源成本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显而易见。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它所带来的技术革新,虽带来了一系列积极性的一面,但也带来些不利,如表中的7-8两项,在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的安全、黑



客的“入侵”都有可能给会计信息安全带来影响；同是也正由于人工智能能够高效地处理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对传统岗位会计人员需求的降低已毋庸置疑，但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会计。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信息、建立模型、模拟未来环境等帮助管理会计完成任务，但是不能完全替代管理会计做出管理决策。因此，无论是财务会计还是管理会计，都有财务机器人不能替代的地方（周耀灵等，2018）。人工智能也难以实现有效的审计沟通与观察，缺乏审计判断能力，也难以保障信息安全，因此，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审计工作（吴伟霞，2018）。

2. 人工智能所带来会计领域深层次的影响研究

人工智能催生了会计新模式，在人工智能技术下，会计数据实现质的飞跃，会计核算模式发生变化，它使得会计核算流程更加真实、可靠和及时；会计报告模式更加多样、相关和有效；人工智能还重塑会计理念、重构会计学学科结构和亟待需要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王加灿等，2017）。人工智能催生了审计作业模式的革新，即“人工智能+审计”作业模式，该模式应用初期，实现部分审计工作自动化，而在“人工智能+审计”作业模式应用的成熟阶段，审计工作将实现全面自动化（刘杰等，2019）。

人工智能降低了传统会计岗位的人才需求，同时也带来新的工作岗位和职能需求，综观众多学者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白媛媛（2018）、陈敏洁（2018）等大部分的学者提出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预测决策、控制评价、战略层面、风险管理等管理会计的工作。第二，李秀娟、陈元艺（2018）等提出随着财务信息化系统的持续发展，财务机器人的开发、应用和维护，需要一批既要懂财务知识，又要懂计算机编程、计算机维护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出现。因此，会计人员未来的职能会体现在人工智能的开发和维护方面。第三，解决人工智能环境下财务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研究人员，陈敏洁（2018）提出的人工智能背景下可能会出现新的舞弊形式和错误类型，需去研究一些新的审计方法以便更有针对性、实效性地开展审计工作。并且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深入，其工作岗位和职能都将不断变化，刘杰等（2019）在人工智能应用的前期，从事基础审计工作的人员将面临失业危险，而审计职业判断和出具审计报告会被暂时保留下来。到人工智能应用的中期，为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审计行业将会兴起很多新的岗位或职业，如审计数据分析师。到人工智能应用高度发达的时期，多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实现整合运用，审计行业可能仅仅需要审计规则制定者，以及多项人工智能技术整合运用的开发人员，绝大部分传统审计岗位将消失。

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型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实证型会计向价值型会计改变的趋势日渐明显，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融合，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已成大势所趋，为此，有 41 位学者专门以“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融合）”为主题探讨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区别、转型（融合）的意义、转型策略等。

1. 转型（融合）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

许安国（2018）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财务会计方法已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管理会计思维更适合人工智能化的要求，同时企业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也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需求。高连术（2018）还提出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符合国家宏观政策要求，也适应了技术因素带来的工作职能变，满足了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徐谦（2018）认为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能够实现数据同源，推动企业精细化管理；提升效率，节约成本；强化内部控制，把控风险；能够为企业创造新价值。）朱宁（2019）认为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全面提升，发挥会计的管理职能，有利于创建企业战略与财务绩效间关系，增加企业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2. 转型（融合）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许安国（2018）、刘磊（2018）王立炜（2018）、郑重（2018）等学者对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了论述，其主要观点归纳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企业管理层对企业财务管理不够重视，对人工智能在会计中作用缺乏认识，对会计职能缺乏认识；第二，企业会计人员知识体系过时，对信息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够，其能力和素质无法满足管理会计要求；第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财务信息系统不完善，导致管理会计职能无法发挥作用。第四，企业不同部门的财务和业务之间缺乏合作，没有得到有效整合，管理会计作用受到限制。

3. 转型（融合）的策略研究

41 位学者对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融合）的都提出的一些建议或策略，笔者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与统计，归纳出 10 条主要的应对策略。见表 3

表 3: 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策略统计表

主要观点	频率
1.开展培训或自学，提高财务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含业务能力、管理能力、领导力和沟通能力等	29
2.加强信息化建设，有效利用科技手段	28
3.改变传统的财务管理理念和财务定位，提高管理会计意识，重视管理会计工作	19
4.改进管理模式，建立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	18
5.整合资源，实现业财融合，实现数据互通，建立财务共享中心	15
6.重新划分财务组织结构和财务人员结构	12
7.对于信息化基础较薄弱的中小企业可将财务基础核算职能外包到外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2
8.重视会计理论创新	2
9.借助 AI 优化财务信息处理流程	1
10.从国家层面优化政策实施完善技术应用机制	1

人工智能对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

会计人才的培养主要在高校。目前高校的会计课程体系是以财务会计为主，管理会计等为辅，这也就意味着高校培养的人才体现的是核算职能，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导致了对会计职能需求的变革，需要的是价值创造的职能，这也就意味着高校的会计教育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模式和考核方式都需要发生变革。



1. 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人员应具备的能力和素质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财务机器人的深入发展，会计人才需求特点随之而来的变化。王颖（2018）提出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人员应具有综合管理能力、跨专业领域的立体知识网络、持续学习的能力。齐殿伟（2018）提出智能财务会计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是良好的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职业判断能力、理论创新能力、应用复合型人才、具备高智能商数。韩小芳，刘冰洁（2019）还提出人工智能时代会计人员应具备较强的战略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和良好的职业操守，同时熟练操作人工智能的信息技术管理能力。

2. 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李秀娟 陈元艺（2018）提出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人才培养理念应扩展人本主义理论，以“人-机”互动模式为核心。会计人才的培养应更加注重对会计人员在“人”的智慧与计算机高性能信息处理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应更加注重会计人才对计算机的使用以及对计算机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培养，培养会计人才的财务管理意识，培养会计人才参与企业管理意识，既要树立“算为管用”又要加强“析为管用”的意识。吕南（2019）会计人才的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智商、财商与情商”为目标，着力培养管理型、复合型、应用型和国际化的会计人才。宿晓、代益香（2019）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环境下构建“以用定课、以训代教、以赛促学”的“三位一体”新型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实施框架。章君（2019）提出“互联网+”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会计教育新模式，通过整合资源，构建适用性“互动互生”大生态系统以培养高技术复合智能型会计人才。

在具体的课程体系设置方面会计课程与人工智能课程进行融合已达成共识，应该学习人工智能与会计的融合课程，但在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一定的争议。商思争、陈建芸等（2018）认为应用型高校培养的、学习的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和会计的融合课程，还应当开设融合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财务会计一般理论课程，不应只是局限于人工智能和会计的融合。彭茶芳（2019）提出压缩一些核算型课程的课时并适当降低难度系数，建立管理会计分层级的课程群。商思争、陈建芸等（2018）则认为财务会计课程具有比原先更重要的地位，但是这里的财务会计课程指的是财务概念框架。王加灿、张紫馨等认为会计学生需要的是巧妙和熟练的使用人工智能，而商思争和黄柳苍认为会计学生还需要学习计算机编程技术，以实现和计算机专业人员合作开发。刘恺琳（2019）也提出高校应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增设高级 Excel、算法、数据获取与分析等课程。吕南（2019）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课程要求，提出调整基础类会计课程的比例，加大公司战略、风险管理、预算编制、绩效衡量、决策分析等管理会计课程体系的比例，增设数据处理与分析、基础编程教学等课程。同时嵌入大数据、云计算方法的基础教学。彭启发等（2019）还提出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会计学科建设和会计职业教育是为防止人工智能带来的过度依赖技术风险。

在教学方法、手段和考核方式方面，革新、左占卫（2016）研究认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有助于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刘恺琳（2019）主张生本教育，主张“先做后学”“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最后实现“不教而教”的目标，并提出深化产教融合，高校应与企业一一对接，聘请企业精英对学生开展技能培训。陈小芹（2019）提出以学生能力素养为主要评价内容，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职业道德、沟通能力、执行能力等多维度实行综合评价。可采用笔试、提交报告、答辩等多种方式组合的形式，充分发挥考试的激励导向作用。



在师资队伍建设和方面，可以利用假期，鼓励教学队伍积极参加信息化教学、人工智能研发等讲座培训（王诗憬，2019），也可以邀请校外会计行业的专家、学者，如企业的高层、互联网先驱等为教师与学生进行行业最新的知识讲座与培训（陈小芹，2019）。还可以将 AI 行业的人才引入学校做客座教授，改变学生的思维（董少校，2019）。

研究结论与展望

1. 我国人工智能带来的会计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热度主要是近两年，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性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会计领域的影响，包括对会计行业、会计工作、会计教育带来的影响，但研究还局限在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的科学判断。而且现有的研究发表的核心期刊较少，其研究成果缺乏深度，缺乏权威性。

2. 人工智能给会计领域带来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会计和审计的基础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也已达成共识，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会计工作被人工智能替代的程度究竟有多高，未来的会计岗位和会计职能究竟如何，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 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会计学科的重构，会计学科必须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培养复合型会计人才。但会计学科与哪些学科融合，融合的深度如何，在各高校目前的状态下如何实现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建立高职高专、应用型本科、研究型本科，甚至研究生的人才培养模式仍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实践。

4. 我国人工智能会计研究近两年发表数量虽明显增长，但其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研究独立且分散，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还不成熟，会计教育的变革、会计人才的转型、培养和提升都需要政策制度的保障和实径，因此，在未来可以对国际人工智能会计的发展研究进行探讨，借鉴其成功经验据以在我国具体行业和领域进行实践，进而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会计的相关政策制度完善、组织方式创新、会计人才培养提升等，探索出中国特色人工智能会计实现路径。

主要参考文献:

- [1] 韩小芳,刘冰洁.人工智能时代会计人才培养的制约因素及应对[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36(02):92-95.
- [2] 武晓芬,田海洋.中外人工智能审计研究热点及演进知识图谱比较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10):185-191.
- [3] 刘杰,廖捷,董海云.人工智能与审计变革[J].财会通讯,2019(13):19-25.
- [4] 章君.“互联网+”人工智能视域下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改革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1):58-63.
- [5] 彭启发,王慧秋,王海兵.会计人工智能存在的风险与对策研究[J].会计之友, 2019(05):114-119.
- [6] 张媛,刘海,李中傲.“智慧财务”下创新教育对人工智能商数的需求——以数据分析法案例教学为例[J].财会月刊,2018(24):98-104.
- [7] 唐莹.浅议人工智能时代企业财务管理的转型[J].财务与会计,2018(23):69.



- [8] 戚蓓蓓.基于人工智能视角的财务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应用探析[J].财务与会计, 2018(17):58-59.
- [9] 王颖.人工智能时代会计教育的变革[J].科技经济市场,2018(04):167-169.
- [10] 王加灿,苏阳.人工智能与会计模式变革[J].财会通讯,2017(22):41-43.
- [11] 陈婷蔚.人工智能在会计领域的应用探析——以德勤财务机器人为例[J].商业会计,2018(10):77-78.
- [12] 周元元,贾晓柏.人工智能在财务业务一体化中的应用[J].财会月刊, 2007(31):60-62.
- [13] 李秀娟,陈元艺.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人才需求与培养路径研究[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05):91-92.
- [14] 梁荣华,史济建.人工智能在财务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应用[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1(08):118-121.
- [15] 冯静.人工智能财务决策支持系统研究[J].上海会计,1999(04):39-41.
- [16] 邓文伟.人工智能时代的会计研究综述[J].国际商务财会,2018(05):86-88.
- [17] 周耀灵,方莹,唐依珂.人工智能发展下会计人员的不可替代性探析[J].中国市场,2018(11):98+102.
- [18] 白媛媛.人工智能对财务人员的影响及转型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18(04):257-258.
- [19] 陈敏洁.人工智能冲击对基础会计从业人员的影响[J].现代企业, 2018(04):82-83.
- [20] 吴伟霞.人工智能对审计工作的影响[J].中外企业家,2018(10):155+159.
- [21] 张毅猷.浅谈人工智能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商论,2018(06):16-17.
- [22] 陈红.人工智能在会计管理中的应用探析[J].知识经济,2018(02):108+110.
- [23] 雷力平.浅析人工智能对会计行业的影响[J].会计师,2017(21):7-8.
- [24] 黄燎隆.略论人工智能技术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J].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9(12):47-51.
- [25] 汪晶.人工智能在高校财务服务中的应用研究——以电子科技大学为例[J].教育财会研究,2017,28(06):76-80.
- [26] 黄柳苍.人工智能发展对会计工作的挑战与应对[J].教育财会研究, 2017,28(02):3-8.
- [27] 王诗憬.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会计人才培养思考[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9(06):290-291.
- [28] 陈小芹.人工智能时代会计人才培养模式[J].商业会计,2019(09):127-129.
- [29] 吕南,鲁娅珺.人工智能背景下“四位一体”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商业会计,2019(08):110-113.
- [30] 刘恺琳,徐桐,张婉姝,张晓丹.人工智能趋势下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改革[J].现代信息技术,2019,3(07):172-174.
- [31] 彭茶芳.人工智能环境下会计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现代企业,2019(03):20-21.
- [32] 宿晓,代益香.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环境下创新型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J].商业会计,2019(03):116-118.
- [33] 齐殿伟.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重构——以长春理工大学为例[J].商业会计,2018(16):122-124.
- [34] 商思争,陈建芸,戴华江,骆阳.会计机器人时代应用型高校会计专业财务会计课程地位探讨[J].财会月刊,2018(05):132-136.



- [35] 孙红喜.大数据时代财务共享中心服务模式探讨[J].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2017(19):210-211.
- [36] 左占卫.加强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研究[J].商业会计,2016(03):107-109.
- [37] 徐英杰,顾琳琳,邓金鹏.人工智能技术在虚假会计信息发现机制中的应用[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05(02):223-225.



收入、公共服务对中国居民幸福感影响研究

THE IMPACT OF INCOME AND PUBLIC SERVICES ON CHINESE RESIDENTS' HAPPINESS

佟柏翰^{1*}, 王心玥²

Bohan Tong^{1*}, Xinyue Wang²

¹泰国正大管理学院

¹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²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²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einrichtong@163.com

摘要

收入、公共服务水平都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于幸福指数的研究成果,提出两个假设,一是好的公共服务质量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二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已经高于收入。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客观幸福指数,并与主观幸福指数一起,通过隐变量结构方程模型综合考察公共服务和收入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由所得结论拓展出一个疑问,进一步检验老年及残疾或失业居民与具有劳动能力的非老年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得到的研究结果显示上述提出的两个假设均得到印证。

关键词: 公共服务 幸福指数 主成分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

Abstract

Income and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are all important indicators that affect happines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happiness index,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hypotheses: one is that good public service quality helps to improve residents' happiness; the other i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on residents' happiness is already higher than income. In 2015 by China's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data,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build the objective happiness index, an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public service hidden variabl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the impact of income of Chinese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by the conclusions extend out of the question, further inspection elderly and disabled or unemployed people and of the impact of labor ability of elderly residents' well-be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hypotheses mentioned above are confirmed.

Keywords: Public services, Happiness index, Incom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引言

当今时代,随着各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生活水平逐渐改善,吃饱穿暖已不再是让人发愁的难题,人们转而更加重视生活的质量和舒适。国民的关注重点已经从最初单纯的



看 GDP 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回归到国民自身的幸福问题上来。从国民生产总值 GDP 到融入环境因素绿色 GDP，再到国民幸福指数量化体系的提出以及著名 Easterlin 悖论的出现，不难发现人们已经开始思考用 GDP 衡量一切是否合理。让人民幸福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研究目的

如何准确衡量人们幸福程度就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幸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量化，才能进行后续的分析研究，“国民幸福指数”（GNH）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我们就有了两个从不同方面判定国家是否繁荣的标准，GDP 是衡量国家经济水平的标准，而 GNH 就是衡量人们幸福快乐的标准，GNH 的提出对于转变发展的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

GNH 的地位与 GDP 一样，都很重要，都是衡量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它有助于观察 GDP 没有覆盖到的指标；另一方面，在当前我国强调以人为本的形势下，加深对“幸福”的认识研究，可以更好地帮助政府了解人民的真正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幸福建设服务。

政府在整个社会平稳运行中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的管理和安排都应是为人民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而政府的公共服务方面综合体现了国家的管理服务水平，好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此外，收入仍然是人民看重的基础指标，没有经济基础就谈不上幸福。

研究收入和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文献综述

朱金鹤（2017）综合考虑机会与结果公平共享，选取生存环境、经济包容、公共服务、日常消费、公共安全 5 个指标构成指标体系；李刚与王斌（2015）通过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社会进步、社会满意度和环境满意度等五个方面筛选客观指标构造一个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公式。公元前 6—7 世纪，政治家梭伦（前 593 年）提出：许多有钱的人并不如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幸福；美国经济学家 Easterlin（1974）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 Easterlin 悖论，即：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能增加居民的幸福感；Campbell 等（1976）研究发现，个人收入对幸福感影响不显著；Haring（1984）通过低平均相关系数推断出收入对幸福感影响小的结论，后来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丁述磊（2016）研究分析发现一些公共服务方面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Grimes（2016）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政府能够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人幸福感会更高。卜芳等（2017）通过对 CGSS 2013 年数据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综合国内外文献的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研究成果，本文全面考虑幸福可能的客观影响因素，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人际交往、经济状况、身心健康、生存环境，进行幸福指数的构建，公共服务、收入与居民幸福感。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两个假设，假设一：提升居民幸福感可以通过改进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来实现；假设二：在当今经济水平迅速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已经不及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定性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数量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模拟法，定性分析法：判断幸福程度和主观幸福指数之间联系，文献研究法：结合了之前国内外学者的对于收入、公共服务对幸福感的影响，重点查阅了国内学者的调查研究与国内权威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定量分析法：是基于将各个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将指标变为具体数值。跨学科研究法：本文结合了统计学、数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进行研究。模拟法：建立了数学模型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

1. 客观的幸福指数构建

多数学者都是以问卷上的关于幸福程度的直接回答作为研究变量，幸福是动态指标，一个时点上的关于幸福与否的回答是片面的。幸福指数的构建也是幸福感研究的一大重要板块，然而许多学者都忽略了这一点。因此本文科学地根据居民的各项生活指标构造客观幸福指数，研究与问卷上的关于幸福程度的回答的主观幸福指数之间的一些关联，综合考虑主观客观幸福程度两方面进行公共服务满意度和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研究

1.1 样本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选取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该数据覆盖全国28个省/市的478 个村居，共获得有效问卷6325份，得到的居民样本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地区，具有一般的代表性。其中男性占比为48.6%，女性占比为51.4%，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初中学历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28.9%；技校学历的人最少，占总人数的0.6%。年龄在60岁以下的非老年人口占60.9%，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39.1%。

1.2 SEM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简称SEM，也叫协方差结构模型（或因果模型），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

(1) SEM模型可以处理不能准确、直接地测量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传统统计分析不能

(2) SEM模型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可以存在测量误差

(3) SEM模型可以输出不同模型对同一数据的拟合程度，从而进行模型之间的比较，选出最能呈现数据关系的最优模型。

由于研究涉及到不可直接观测和测量的潜变量，因此本文使用Amos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计算分析。

SEM模型包括两部分，分别是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

测量模型度量的是潜变量和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表示为：

$$x = \Lambda_x \xi + \delta, \quad y = \Lambda_y \eta + \varepsilon$$

其中x为外生变量(Exogenous variable), y为内生变

量(endogenous variable); Λ_x , Λ_y 为因子载荷矩阵; δ , ε 是误差项。

结构模型度量的是潜变量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表示为： $\eta = B\eta + \Gamma\xi + \zeta$ 其中 ζ 是误差项, ξ 是外生变量对应的潜变量。

本文选择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以分析收入和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两个潜变量，一个为居民幸福感，一个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状况。其中幸福感潜变量对应的指标分为主观幸福指数和客观幸福指数，两个指标取值为1到5，取值越大表示居民幸福感越高。公共服务满意情况包括9个方面服务满意度，分别为：公共教育(Edu)、医疗卫生(Med)、社会管理(Man)、住房保障(Hous)、社会保障(Sec)、劳动就业(Job)、基本社会(Bas)、公共文化与体育(Cul)和城乡基础设施(Inf)。问题的回答采取满分100打分制，分数越高表示对公共服务这一方面的满意度越高，为了便于数据分析，将所得分数/100，将满意度变为取值范围在[0, 1]的连续变量，将个人年收入/10000，变为以万为单位的连续变量。

潜变量	指标	变量说明
幸福感	主观幸福指数(Sub)	取值为1到5，数值越大越幸福
	客观幸福指数(Obj)	取值为1到5，数值越大越幸福
公共服务满意情况	公共教育服务(Edu)	公共教育服务分数/100
	医疗卫生服务(Med)	医疗卫生服务分数/100
	住房保障服务(Hous)	住房保障服务分数/100
	社会管理服务(Man)	社会管理服务分数/100
	劳动就业服务(Job)	劳动就业服务分数/100
	社会保障服务(Sec)	社会保障服务分数/100
	基本社会服务(Bas)	基本社会服务分数/100
	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Cul)	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分数/100
	城乡基础设施服务(Inf)	城乡基础设施服务分数/100
外生变量		
个人年收入	个人年收入(income)	2014年个人年收入/10000

图 1: 变量选取

本文拟合的结构方程模型，表明了幸福感与公共服务、收入之间的结构关系，初步拟合的模型各项拟合指数不符合要求，拟合效果不理想，因此通过CR系数和修正指数对原模型进行修改优化。

表1为优化前以及优化后SEM模型的拟合优度值对比。通过表格可以看出优化后的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比优化前的要好，且所得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该模型效果理想，能真实地反映变量之间内在结构关系。

表 1: 优化前以及优化后 SEM 模型的拟合优度值对比

评价指标	优化前指标值	优化后指标值	判断值
χ^2	1931.182	314.051	越小越好
GFI: 拟合优度指数	0.847	0.991	>0.9
NFI: 规范拟合指数	0.850	0.992	>0.9
IFI: 用自由度调整后的 NFI	0.851	0.993	>0.9
RFI: 相对拟合指数	0.837	0.988	>0.9
PGFI: 简效良性拟合指数	0.617	0.571	>0.5
CFI: 比较拟合指数	0.851	0.993	>0.9
RMSEA: 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0.093	0.034	<0.08



表2为模型中路径系数估计值、标准误、CR 系数（临界比率）以及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所有路径系数和载荷系数均显著，拒绝系数为 0 的原假设。

表 2: 幸福指数模型路径系数

			路径系数	标准误	C. R. 系数	显著性
happiness	<---	serv	0.690	0.079	13.408	***
happiness	<---	income	0.135	0.000	4.291	***
Job	<---	serv	0.826	0.021	61.114	***
Man	<---	serv	0.827	0.018	63.879	***
Sub	<---	happiness	0.249	—	—	—
Obj	<---	happiness	0.329	0.092	11.208	***
Med	<---	serv	0.767	0.016	68.237	***
Edu	<---	serv	0.724	—	—	—
Bas	<---	serv	0.754	0.020	58.220	***
Cul	<---	serv	0.742	0.019	57.657	***
Hous	<---	serv	0.763	0.021	58.703	***
Sec	<---	serv	0.842	0.018	65.152	***
Inf	<---	serv	0.740	0.018	57.779	***

表3为方差拟合结果，由表可看出，没有出现数值过大的无意义方差且方差均为正数，因此方差结果是有效的且所有方差估计值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表 3: 方差拟合结果

变量	方差	标准误	临界比率 (C. R.)	显著性
error1	0.015	0.000	72.154	***
error2	0.013	0.000	47.803	***
error3	0.018	0.000	48.311	***
error4	0.011	0.000	45.546	***
error5	0.012	0.000	44.544	***
error6	0.010	0.000	44.408	***
error7	0.017	0.000	71.139	***
error8	0.017	0.000	71.139	***
error9	0.015	0.000	72.154	***
error10	0.021	0.006	3.374	***
error11	0.590	0.012	48.482	***
error12	0.343	0.009	38.803	***

通过修正指数和CR系数对原模型进行修改优化，得到以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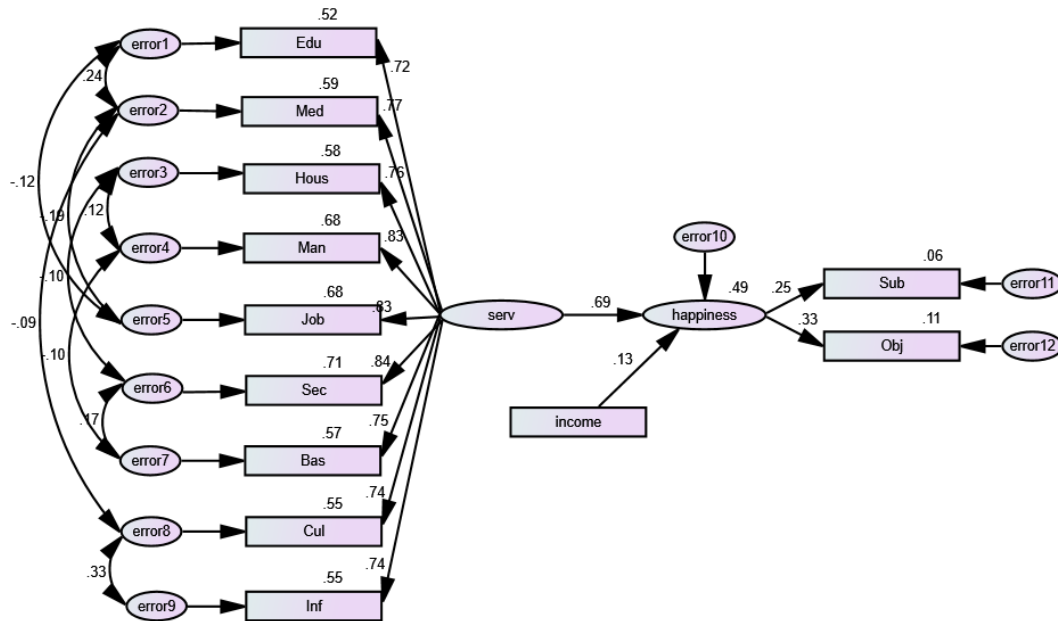


图 2: 优化后的结构方程模型

由所得模型可看出，收入这个外生变量对幸福感的路径系数为0.13，远小于公共服务潜变量对幸福感的路径系数0.69。由此可见，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公共服务满意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已经高于收入，印证了假设二。对公共服务的提升建设，有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这一结论，与本文假设 1 吻合。可见，现今要提高居民幸福感，不应一味追求经济层面的发展提升，政府还需要顺应广大人民的需求，改善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在公共服务包括的9个方面中，路径系数最大的是社会保障服务(Sec)，为0.84，意味着其中社会保障服务满意度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社会保障服务是国家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基本生活的制度。社会保障服务是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政府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是国家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此外社会管理服务(Man)、劳动就业服务(Job)的路径系数为0.83，仅次于社会保障服务。可见社会管理和劳动就业服务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关键服务方面。主观幸福指数的路径系数为0.25，略小于客观幸福指数的路径系数0.33。

1.3 拓展研究

由于社会保障服务是保障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生活的制度，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跟年轻健壮的居民的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否一致本文进行了拓展研究

为解开此疑问另外拓展一个模型：把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残疾或失业人分为一组，具有劳动能力的60岁以下非老年人分为另一组，再进行SEM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表 4 为模型评价结果。所得模型指标值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该模型效果理想。

表 4: 模型评价结果

评价指标	模型指标值	判断值
χ^2	493.622	越小越好
GFI: 拟合优度指数	0.986	>0.9
NFI: 规范拟合指数	0.986	>0.9
IFI: 用自由度调整后的 NFI	0.989	>0.9
RFI: 相对拟合指数	0.981	>0.9
PGFI: 简效良性拟合指数	0.626	>0.5
CFI: 比较拟合指数	0.989	>0.9
RMSEA: 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0.027	<0.08

得到两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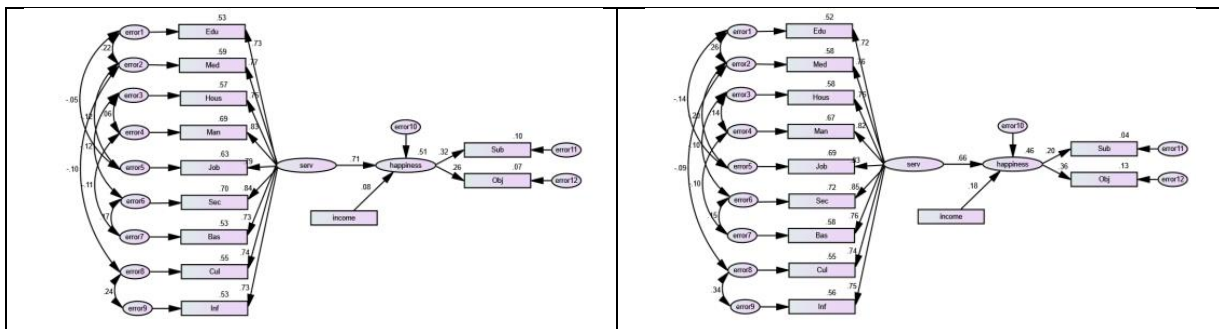


图 2: 两组不同数据拟合的结构方程模型对比

由图可看出，老年人及残疾或失业人口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幸福感的路径系数为0.71，大于具有劳动能力的非老年人的路径系数0.66，说明前者比后者更看重公共服务水平。后者收入对幸福感的路径系数0.18大于前者的0.08，由此可看出对于60岁以下且还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来说，收入仍然是影响幸福感的一个关键因素。对老年人及残疾或失业人口来说，在公共服务中他们更在意社会管理服务(Man)和社会保障服务(Sec)。对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轻人来说，劳动就业服务(Job)、社会保障服务(Sec)更为重要一些。老年人及残疾或失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指数路径系数为0.32，略大于客观幸福指数路径系数0.26；而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轻人的主观幸福指数路径系数为0.20，小于客观幸福指数路径系数0.36。可见通过不同人群对比，结果正好倒过来了：老年及残疾或失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更重要一些，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轻人客观幸福更重要一些。

总结

本文通过 CGSS 2015 年的数据从公共服务的 9 个方面全面考察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老年人及残疾或失业人与具有劳动能力的非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对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得出以下结论：



对公共服务的提升建设，有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且比起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更显著。在9个方面公共服务中，社会保障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最大且是正向影响，可见居民十分关注社会保障服务，重视社会保障服务的质量，服务质量越好居民越幸福。此外加强社会管理和劳动就业服务，维持社会安定以及为年轻人提供就业保障也能较大提高居民幸福感。同时收入仍然是影响幸福感的基础指标，收入正向影响幸福感，要提升居民幸福感依然可以考虑提高居民个人收入这方面。

老年人及残疾或失业人比具有劳动能力的非老年人更看重公共服务水平，对于后者来说，收入也是影响其幸福感的一大因素。

对老年人及残疾或失业人来说，在公共服务中他们更在意社会管理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对具有劳动能力的非老年人来说，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服务更为重要一些

讨论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提高收入仍然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举措，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首要任务仍然是当前地区经济发展，要考虑给与适当的更多资金和政策倾斜。在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考虑别的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方面。

(2)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建设改进国民幸福社会保障体系。现今要提高居民幸福感，不应一味追求经济层面的发展提升，政府应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进行转变，为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推动经济稳步增长，同时加强公共服务建设，从各方面提高居民幸福感。

(3) 尤其对老年人及残疾或失业人更要重点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其中尤其要注重社会管理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建设。

(4)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非老年人来说，收入的增加也相当重要，除社会保障服务外，还应该为其提供更加完善的劳动就业服务，出台政策保障非老年人的就业问题，确保非老年人获取优质均等的劳动就业服务。

参考文献

- 陈礼开、郑祥江、皇甫红姣.(2020).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 系研究——基于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广东农业科学*, (05), 146-152.
- 董秦男.(2019). 中国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合作经济与科技*, (12), 139-141.
- 范静安.(2020). 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分布与预测.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 冯小雪.(2020). 我国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侨大学.
- 黄曦、傅红春.(2019). 财政支出政策、收入水平与居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分析. *经济与管理*, (02), 38-44.
- 欧青松.(2019). 城乡户籍、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在公共服务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中的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厦门大学.
- 任亮宝.(2020). 经济地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基于 CGSS2013 数据的实证研究. *统计理论与实践*, (03), 43-49.
- 许海平、张雨雪、傅国华.(2020). 绝对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 CGSS 的微观经验证据. *农业技术经济*, (11), 56-71.
- 杨冰玉.(2019).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大学.



- 易成栋、任建宇、高璇.(2020).房价、住房不平等与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2015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06), 105-117.
- Abdelouahab, B., & Guendouz, H. (2019). *Quality of Life and Welfare Economy (A Case on Algeria)*, 3(2), 8.
- Elizabeth, K., Bjornskov, & Michael, R. C. (2007). Diabetic Muscle Infarct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Pathogenesis and Management. *Neuromuscular Disorders* 1995, 5(1).
- Grimes, R. (2016). Subjective Well Being Impacts of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Fiscal Policies. *The Journal of ERSA*, 3(1), 43-67.
- Hamoudi, I., & Bendhina, M. (2019). Government Housing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A Standard Study*, 3(1), 9.
- Helliwell, Huang, H., & Grover, S. (2014). *Empirical Linkages Between Good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Well-Being*. Working Paper,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 Hessami. (2010).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 *Kyklos*, 63(3).
- Moudjahid, A., & Abdarrazak, B. (2019). *Psychology of Quality of Life and Its Relation to Psychology*, 3(2), 6.
- Mustapha, E., & Imene, B. (2020). Contribution of Income to the Improv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Rural World in Algeria. *Case of the Province of Mascara*, 4(2), 7.
- Zavras, D., Kyriopoulos, I., & Kyriopoulos, J. (2020). What Influences Self-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During an Economic Recession?. *The Case of Greece*, 4(2), 9.



影响科技扶贫因素研究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CHNOLOG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陆铭宁

Mingning Lu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576339482@qq.com

摘要

贫困问题是各国致力解决的问题，是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科技扶贫是当代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政策与制度因素、人员激励因素、项目与资金因素、地区现状因素、绩效考核因素等方面。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因素，优化科技扶贫人员配置、有效激励人员科技扶贫相关人员包括扶贫科技人员和贫困地区贫困人员的潜力，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科技扶贫的关键。但是，科技扶贫“人”的因素需要有效发挥作用，需要政策和制度的引领和约束。不同的贫困地区，科技扶贫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方式方法、具体实施路径、科技扶贫的效果等，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并不一致，需要不一致的科技扶贫。在所有影响因素中，重要的还表现在资金因素。资金因素会影响项目的设置和实施，也能影响人员的有效激励。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发现，影响科技扶贫的因素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独立性，在绝大多数实践中，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这些因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共同构成了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整体，共同推进或者限制科技扶贫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科技扶贫 影响因素

Abstract

Poverty is a problem that all countries are committed to solving, and an important issue for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overty alleviation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The factors affec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diverse, mainly including: policy and system factors, personnel incentive factors, project and funding factors, regional status factor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actors, etc. . Among these factor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human" factor.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personnel and effectively motivating personnel. The potenti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personnel, including those involv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ose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stimulates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human



beings. It is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However, the "human" factor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eds to be effective and requires the guidance and constraints of policies and systems. Different poverty-stricken areas have different method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ifferent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is is because the resource endowment structure of different regions is not consistent and requires inconsistent techn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Among al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most important is also the capital factor. Funding factors will affect the setup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 incentives for personnel.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only reflect their independenc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most practices, these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hese factors ar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overal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jointly promote or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verty allevi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引言

科技扶贫作为科技创新在贫困地区的应用于实践,对其进行探讨需要了解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科技扶贫的关键因素有哪些?二是这些关键因素哪些是重要的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科技扶贫在实施中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因此,本文通过运用定量方法对相关理论进行专业,探讨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互相作用的关联性;这些影响因素在实践中是与贫困问题相互作用的机理。通过对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科技扶贫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际组织、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包括人才、资金、科技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创新氛围等多个要素,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需要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三方面协同演进。科技创新体系由以科学研究为先导的知识创新、以标准化为轴心的技术创新和以信息化为载体的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三大体系构成,知识社会新环境下三个体系相互渗透,互为支撑,互为动力,推动着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管理与制度创新的新形态。创新动力推进社会发展,科技的重要性在贫困地区发展中尤为凸显。科技扶贫是科技创新战略实践中的重要部分,即将科技创新的理念与实践落实在扶贫工作中。科技扶贫是现代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不管从什么视角出发解决贫困问题,都需要有针对性的实施相应的对策。有效对策的提出,需要认真分析相关问题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从科技扶贫的视角出发,整理、挖掘、分析影响科技扶贫的相关因素。



文献综述

经过对前人的研究发现：扶贫、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持续减贫、科技扶贫、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专题均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丰硕的研究成果给未来的研究奠定了丰厚且扎实的基础。周华强（2017）分析了中国科技扶贫工作面临的问题，设计了“国—省—市—县—村”五级科技服务体系和“科技扶贫在线”建设框架，并构建出“以人为核心构建服务体系、以科技服务支撑产业发展、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脱贫奔小康”的科技扶贫工作路径。吴乐（2018）提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要以特色产业发展为重要着力点，通过“互联网+”“金融+ ”“生态+”等创新扶贫模式，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熊娜（2018）从贫困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乡村特征等三方面揭示了扶贫科技供需均衡的影响因素。周华强（2017）研究认为，政策、投入、科技是中国式扶贫开发工作的三大驱动要素，但各要素在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现阶段，科技正处于进军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历史机遇期。当前针对深度贫困地区，有大量科技支撑脱贫攻坚的相关案例和报道，但缺乏与科技扶贫结合的研究文献。民族地区是中国深度贫困的集中地带，存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农村居民增收难、劳动力技能培训不足、城镇化进程阻力大、精准扶贫效率不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效果弱、环保综合效果不足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王延中等，2018），因此激发内生动力不仅需要理论支撑，还要有实践的指导（黄承伟，2019）。本文也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技扶贫进行深入的研究。

2.1 科技创新理论

是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涉及到科技创新的多元因素。戴运辉（2020）提出“努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人才及团队建设是核心。刘素、郭小华、杨宇、李斌（2020）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通过对科技人才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有助于提高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因此，既要发挥科技人才的核心作用，也要积极推进构建科技创新团队，做好科技创新的引领工作。同时，也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实施方案，努力推动科技创新团队能力的提升。合理评价人才及其团队，特别是绩效评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激励科技创新的潜力。在团队建设过程中，注重文化建设，创建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科技创新文化，构建科技创新软实力。当然，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培训、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科技创新体制搭建、科技创新政策制定与实施等方面，均应做好协同配合，才能有效的提升科技创新的整体效果。

2.2 持续减贫理论

王小林（2019）指出：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事件。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张琦，2020）。

综上所述，要实现科技扶贫对地区发展有影响，急需了解其影响因素，真正找到推进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成果，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对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从科技扶贫视角对影响贫困地区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文献综述方法获得所需资料，得到 4 个影响贫困地区的因素与 3 个科技扶贫特征因素，再根据相关结果制定定量测量工具（调查问卷），得出影响贫困地区的因素、权重。本文的研究目的，从理论层面上讲，是在我国将自主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环节的宏观大背景下，整合科技扶贫中高科技产业集群，从科技扶贫的视角研究影响扶贫产业的因素以及它们互相的关系。通过文献综述确定调查内容，制作调查问卷进行发放，旨在研究和借鉴一些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从科技扶贫角度对我国的贫困山区进行系统的研究，运用科学的方法，尝试着找出基于科技扶贫视角下影响贫困山区的因素以及它们的权重。并通过此理论指导我国科技扶贫项目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

研究结果

本研究为定量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阅读文献搜集科技扶贫相关与贫困山区两个变量及相关研究等方面的资料，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使用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表 1: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百分比
问卷发放 230 份	收回 220 份	100%
	有效问卷 216 份	95.6%
	无效问卷 4 份	4.4%

笔者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收集上来的问卷数据进行录入与分析，以便得出之后的统计结果。本次调查实际总共发放问卷 230 份，整理回收有效问卷 220 份（95.6%），其中 4 份问卷不完整，所以为无效问卷

3.1 信度分析

信度是反映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的指标，测量的信度越高表示测量的结果越可信。通过克隆巴赫信度分析方法对本研进行信度分析，在基础研究中，信度至少应达到 0.80 才可以接受，在探索性研究中，信度只要达到 0.70 就可以接受，介于 0.70-0.98 均属高信度，而低于 0.35 则为低信度，必须予以拒绝。如果信度系数能达到 0.9 以上，就非常理想了。



表 2: 案例处理汇总表

案例处理汇总			
		N	%
案例	有效	216	100.0
	已排除	0	
	总计	216	100.0
a. 在此程序中基于所有列表方式删除			

表 3: 可靠性统计量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924	10

以上数据显示克隆巴赫系数为 0.924，属于高信度。

3.2 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

表 4: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908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490.789
	df	45
	Sig.	.000

反映像相关矩阵，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和 KMO 检验方法分析，观察大部分相关系数都较高，线性相关较强，可以提取公共因子，适合因子分析。在 KMO 中，概率 P 值为 0.000 小于显著水平，变量之间不独立，所以本问卷的效度很高，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KMO 值为 0.908，说明适合因子分析。

3.3 样本基本信息的描述分析

本研究为了能够对样本的基本结构及特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用百分比分析，SPSS 统计软件对样本基本个人信息（性别、年龄、职业等信息）进行分析。



表 5: 调查问卷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选项	人数 (位)	百分比 (%)
性别	男	117	54
	女	99	46
年龄	20-29	105	49
	30-39	65	30
	40-49	44	20
	50 岁及以上	2	1
学历	初中	0	0
	高中	5	2
	专科	7	3
	研究生	80	37
	研究生以上	4	2
行业	研发	18	8
	正府	10	5
	高校	20	9
	制造	56	26
	高科技	112	52
职位	普通工作人员	20	9
	老板	5	2
	高管	30	14
	员工	161	75

通过以上信息对产业人员进行了画像：1、男；2、20-40 岁；3、本科及以上学历；4、高科技行业；5、中高层居多等信息，说明填写问卷人员大多为高科技企业技术人员，填写的问卷具有代表性。



3.4 因子分析

表 6: 公因子方差

公因子方差		
	初始	提取
获取科技扶贫渠道的方式、手段、速度、范围可以降低科技扶贫的研发、生产成本	1.000	.904
有效提高科技扶贫绩效因素是人才的培养	1.000	.905
有效刺激人才的创新绩效是建立系统的晋升机制	1.000	.883
有效刺激人才的创新绩效是薪资激励	1.000	.899
有效提高科技扶贫绩效因素为资金的支持	1.000	.898
有效提高科技扶贫绩效因素为政府政策的支持	1.000	.798
有效刺激人才的创新绩效是简历完善的培训机制	1.000	.912
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对科技扶贫有激励作用	1.000	.660
地区的环境因素对科技扶贫发展影响很大	1.000	.640
产业背景、政府干预等因素对科技扶贫发展影响很大	1.000	.767

由于各指标的共同度表示每一变量被解释的程度，因此可以取每项指标共同度与所有指标共同和之比作为每项指标的权重。

表 7: 各因素权重值

各指标权重值					
因素	初始	提取共同度	共同度总计	权重	排序
获取科技扶贫渠道的方式、手段、速度、范围可以降低科技扶贫的研发、生产成本	1	0.640	8.266	0.077425599	10
有效提高科技扶贫绩效因素是人才的培养	1	0.660		0.079845149	9
有效刺激人才的创新绩效是建立系统的晋升机制	1	0.767		0.092789741	8
有效刺激人才的创新绩效是薪资激励	1	0.798		0.096540044	7
有效提高科技扶贫绩效因素为资金的支持	1	0.883		0.106823131	6
有效提高科技扶贫绩效因素为政府政策的支持	1	0.898		0.108637793	5
有效刺激人才的创新绩效是简历完善的培训机制	1	0.899		0.108758771	4
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对科技扶贫有激励作用	1	0.904		0.109363658	3
地区的环境因素对科技扶贫发展影响很大	1	0.905		0.109484636	2
产业背景、政府干预等因素对科技扶贫发展影响很大	1	0.912		0.110331478	1
总计		8.266	8.266	1	



从权重指标来看，与地区环境和政府相关的两个因素所占比重位居第九和十，说明这两个因素在这十个因素当中相对重要程度和贡献度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大，刨除环境与政府的两个外部因素影响，真正对科技扶贫贡献度和重要程度最大的因素是获取新科技的渠道能力和对人才的晋升机制，这两个因素完全可以说明科技扶贫的发展是要靠实际的人和高技术来体现的，科技扶贫的发展也是要以资金做基础，所以科技扶贫产业发展的主线思路归根结底是要体现在资金支持或政府优惠政策上上，各因素的特征也都是和资金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资金就没有科技扶贫的发展，都是空谈，还是要把所有的理论+实践最后都落实在资金与政策上，此研究才有实际意义。通过权重找到贡献度最大的因素，接下来就要以这两个因素为方向进行战略制定。

局限和建议

通过采用文献分析法、定量分析发现：

第一、科技扶贫是当代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科技扶贫是科技创新理念在贫困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科技在生产生活领域中所展示出的爆发力和推动力已经得以充分体现。在贫困地区，由于缺乏科学技术，缺乏科技创新，造成发展乏力，并逐步拉开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通过案例展示，可以看出：科技扶贫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直接推进了贫困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很多，既有宏观的因素，也有微观的因素；既有涉及到项目与资金这一类的硬指标，也涉及到人员素质这一类的软指标；对其进行归类整理，以及对科技扶贫的实践活动进行分析，发现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政策及制度、人员激励、地区因素、项目与资金、绩效考核等几大类。

第三、科技扶贫的效果取决于多种影响因素。科技扶贫的效果怎样，不仅仅取决于科技创新本身，还取决于政策及制度、人员激励、地区因素、项目与资金、绩效考核等因素对科技扶贫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表现为单一影响，但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综合影响。如政策与制度本身就包含了对人员的激励的配套政策；根据地区及地区差异制定不同的发展政策；项目与资金的配套和使用政策与制度；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项目绩效考核的范围与方式等均需要政策与制度进行约束。科技扶贫涉及到的多个影响因素之间，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独立，在大多数的实践中，都变现为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交织，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贫困问题的解决。

科技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科技扶贫的执行受制于多种要素的影响，对其进行研究，不仅能够具有扶贫理论的构建，更重要的是能够进行扶贫工作的实践性推进，既有理论意义，也存在重要的实践意义。对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分析，一方面是对科技扶贫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进行总结和研究，通过深入分析，找到科技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并能提出通过科技扶贫推进贫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对策思考，为贫困地区脱贫和永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以及为科技扶贫推进贫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工作实施提供方法指导。另一方面，科技扶贫是科技创新在贫困地区的实践和工作开展，需要有有力的理论对其进行支撑。因此，对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有利于建构完善的科技创新理论体系，特别是对



于构建科技扶贫本身的，包括科技与扶贫相融合的地区视角、包括贫困地区扶贫的科技支撑的视角，包括科技创新、科技扶贫、持续减贫、乡村振兴等相互融合的理论研究框架，研究政策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实现多角度结合的实现路径，实现对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理论关注和实践指导，推进贫困地区团结、稳定和永续发展。

毋庸置疑，对科技扶贫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既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性工作，也能推动科技创新与科技扶贫的相关理论探讨和建构。在本文中，主要是运用田野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政策研究法、案例对比研究法等对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探讨。受篇幅有限的限制，在本论文中，仅仅只是在探讨中对科技扶贫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但是，科技创新与科技扶贫、贫困治理和地区发展是一个完整系统，既属于管理学探讨的话题，也是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共同探讨的话题，其系统性、完整性、创新性等均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关于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的多样性问题。在本文中，探讨了科技扶贫的主要影响因素，涉及到政策及制度、人员激励、地区因素、项目与资金、绩效考核等几个部分，这几个不是只是基于作者的想法所做的分类整理。在实践中，除了采用偏质性的陈述而外，采用量化的方法研究诸如：科技的贡献率、科技成果的数量与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比例关系、科技研发投入量、科技成果转化等其他的影响因素。这些都应该是推进科技扶贫实践成果体现的重要内容。

第二、科技扶贫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人”的因素。从管理学的视角看，“人”作为组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同样，在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探讨中，“人”的因素同样是最重要的因素。人能够进行科技创新、人能够进行科技研发与实施、人能够制定战略、人可以实施项目、可以对项目资金进行有效配置、人能够设计规则，人受政策和制度的限制和引导，以上等等都是对“人”这一要素在科技扶贫中的作用阐述。因此，在发展中实施人才驱动战略、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造活力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对应的资源配置中，应该把“人”的影响因素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通过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和引领作用，带动其他资源的更优化配置，实现科技扶贫、科技创新实施的整体效益提升。

第三、科技扶贫的影响因素在实践中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尽管科技扶贫的每一个影响因素都是可以单独的个体，也通过自身的变化影响着科技扶贫的效果。但是，这些个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或者制约等的互动关系。如：人需要政策与制度的约束与激励，人反过来也会制定政策与制度；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影响着项目的实施与落地，项目的实施与落地反过来也会带动下一轮政策与制度的变迁；各个因素因不同的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不一致，会影响其他各个因素之间表现出的不一致的情况。每一个因素的变化均会影响着其他要素的变化或者作用的产生。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科技扶贫是一个整体性的提升工作，站在组织的高度推进每一个要素的结合，或提高相互促进作用、或改进相互制约的提升，在各个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下所表现出来的互动机理以及实施效果，以及通过科技创新推进贫困问题的解决路径问题等均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黄安胜、苏时鹏、王姿燕、许佳贤、黄森慰. (2014). 环境友好型科技扶贫模式初探. *科技管理研究*, 34(24):253-258.
- 黄承伟. (2019). 激发内生脱贫动力的理论与实践[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01):44-50.
- 孙久文、夏添. (2019). 中国扶贫战略与 2020 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10):98-113.
- 孙庆刚、杨建君. (2017). 民族地区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来自新疆城乡数据的 Logit 实证分析. *科技进步与对策*, 34(20):45-50.
- 周华强、冯文帅、刘长柱、杨柳、王敬东. (2017). 科技扶贫项目管理创新研究:理念与实践. *37(11):197-204*.
- 庄天慧、张海霞. (2019). 开放包容:新中国 70 年贫困治理的经验和逻辑.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40(11):144-152.



中国易地搬迁扶贫成效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CATORS FOR IN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JECT—TAKING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李娜

Na Li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研究生院

Chinese Graduate School,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057457671@qq.com

摘要

中国是全球反贫困格局的核心力量，是世界近 25 年减贫绩效最大的贡献者。多年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多种减贫方式。但今天适用的策略，未必适用于未来，需要我们对脱贫，以及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作有效的评价，以助力相对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易地搬迁扶贫是中国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是凉山深度贫困彝区全面脱贫的有力保障。2020 年 11 月，随着凉山彝区深度贫困 7 个县先后验收脱贫，标志着现行标准下的贫困在四川已全部消除。但作为“一步跨千年”的彝区如何在解决好眼前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做好今后的永续发展，需要对扶贫工作成效作全面的、量化的评价，以便为未来更好地发展做好准备。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理论、满意度理论，针对凉山彝区易地搬迁扶贫实际，从精准扶贫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构建易地搬迁扶贫成效评价指标体系，以期总结经验、弥补短板，巩固脱贫成效。

关键词：生态移民 扶贫满意度 扶贫成效 凉山彝区

Abstract

China is the core force of the global anti-poverty activities and the biggest contributor to the world's poverty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 the past 25 years. In many years of China's practice, a varie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ethods have been explored, such a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employ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o on. Nevertheless, the strategies that are applicable today may not be applicabl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kee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latively poor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effective evaluation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China'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 is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the severely impoverished Yi area of Liangshan



to get out of poverty. As the 7 severely impoverished counties of the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have successively achieved this target in November 2020, it indicates that all poverty under the current standards has been alleviated in Sichuan Province.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ing speed ("one step across the millennium") of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 comprehens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s required to solve the absolute poverty in Yi area and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so as to prepare for bett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fter review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us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heory and the satisfaction theory and focus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Liangshan Yi area. Finally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 is constructed from both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rder to summarize experience, make up for shortcomings, and conso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migr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atisfac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iveness, Liangshan Yi Area

前言

贫困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难题。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劳动以及劳动被剥夺的问题，还有诸多方面涉及其中。一方面，贫困既取决于资源、区位、人力资本、地区经济、国家稳定，还取决于发展成果的分配方式，再分配等制度的安排。另一方面，贫困还受到个体意识和文化的影响。联合国在《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世界各国共同进步的目标是，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到2030年时消除极端贫困。距离这一目标仅剩不到10年，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任重道远。把握贫困现状、治理特征，对贫困治理趋势进行研判，在贫困治理的一般性中发掘特殊性和典型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区“一步跨千年”，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着国家精准脱贫战略的深入实施，在各方力量的大力帮扶下，凉山彝区贫困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020年11月，随着该州彝族聚居的普格县、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喜德县、越西县、美姑县等7个国家级贫困县达到贫困县退出有关指标，退出贫困县行列，标志着困扰着凉山彝区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得到解决，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彝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也标志着四川全省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易地搬迁是指将生活在自然条件严酷、生存环境恶劣、发展条件严重欠缺且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相对集中的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口，按照自愿、应搬尽搬原则，搬迁到生存发展各方面条件更合适的地方，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状况的一种扶贫方式。易地搬迁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方式之一，突出地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问题。对于凉山贫困彝区来说，主要是指将散居各二半山区、高寒山区等不适宜生产生活地区的彝族群众，集中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以期迅速彻底有效解决彝区群众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凉山彝区 7 个县摘除贫困县帽子，只是脱贫攻坚一个阶段性工作的完成，下一步还要接受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抽查、国家脱贫攻坚普查、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并不意味着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全面完成，还要对抽查、普查和考核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查漏补缺、动态清零，推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建层次全面、结构合理、权重相宜的易地搬迁扶贫成效指标体系，对凉山彝区易地搬迁扶贫中及时发现问题和短板，做好多部门工作联动，组织好帮扶资源，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有重要的科学指导意义。本文在梳理相关扶贫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满意度理论，针对凉山彝区的实际，构建了凉山彝区易地搬迁扶贫成效指标体系，并对指标体系的运用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研究综述

1. 国外相关研究

(1) 扶贫研究。国外没有与易地搬迁直接对等的概念，相近似的是生态移民理论，二者在实施目的、建设内容、组织方式等方面基本一致，都涉及到生态保护和移民搬迁等核心部分。Townsend 等(2002)认为扶贫不应该只关注一定的区域，这种思想可能会导致资金的浪费与滥用，这会对扶贫的公平性造成负面影响，有可能引发扶贫偏差、资金错位使用等问题。Peske H G(2003)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贫困家庭儿童与富裕家庭儿童成绩相比较低，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享有，教育的贫困是家庭贫困的根源之一。Sen(2003)指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贫困人口自身素质较低能力较差，不仅仅是经济收入不足的问题。扶贫要坚持以改变贫困人口素质为主，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及社会救助以及福利待遇，应该在环境、教育、劳动力等多方面给予帮助。Bass(2006)认为扶贫举措的展开要以尊重与保护环境为前提，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发展与促经济，提出在扶贫过程中要引入生态补偿机制。Mandell and Keast Funder(2007)以印度为对象，以扶贫大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扶贫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且需要加大对农业资金的投入。Funder (2008)以北欧国家为例，认为扶贫工作信息的有效及时反馈对于扶贫管理工作意义重大。Syed Muhammad 等(2009)以巴基斯坦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认为给予贫困人口一定的无息信贷支持对其生存发展有积极作用。Mckague 等(2012)世界贫困人口占比很高的是小农经济结构的家庭，应在信息获取、引入机器化生产等方面给予帮扶。Angus Stewart Deaton(2014)认为政府的有效治理体系和良好的社会公信力是脱贫的关键。C·布鲁克斯(2018)认为要不断推动机会平等，提倡家庭、社区、部门多方联动，以解决贫困问题。

(2) 满意度研究。Mcgil1(2001)对美国多个不同地区的政府绩效进行评估，发现群众的满意度高低与政府的工作绩效成正向关系，因此群众评价可以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指标。Grandy(2009)通过对于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调查，发现不同生活区域的居民对于政府的满意度具有明显差异。总的来看，城市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高于乡村居民。Forrest V. Morgeson 等(2010)以 ACSI 理论为基础研究了电子政务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认为公众满意度对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具有一定正向影响。Nuran Bayram, et al.(2012) 过对土耳其 2493 人的调查研究，论证了贫困、满意度、失业率三者之间的关系。Qizian(2014)认为满意度不仅仅指用户对于产品的满意度，满意度也可以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的研究。He Kongchao, et al.(2015)以贫困地区 100 多名教师为研究对象，认为教育在扶贫中具有重要意义。认为贫困地



区教师对其工作满意度偏低,影响了扶贫工作绩效。他认为在教育扶贫中不仅需要关注经费和孩子,还应对教师待遇加以关注,并且注重其职业培训。

2. 国内相关研究

(1) 精准扶贫研究。贫困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对“贫困”问题研究较早,但精准扶贫概念是我国提出的,相关的研究以国内研究为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概念的界定。全承相(2015)提出扶贫不仅是资金上的帮扶,做好贫困户职业培训是确保贫困人口自身具有脱贫生存能力。葛志军等(2015)认为精准扶贫主要包括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精准四方面内容。庄天慧(2016年)认为精准扶贫的内涵主要表现为扶贫“对象—资源—主体”精准、扶贫“目标—过程—结果”精准以及“微观—中观—宏观”的不同扶贫层级精准。汪三贵、郭子豪(2015年)指出帮扶对象要精准,帮扶措施要精准,才能实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二是对于考核机制的梳理。张翼(2016)指出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包括识别不精准、扶贫计划实施中断、缺少后续反馈、以及评估工作的缺失等。刘辉武(2016)以贵州为例调研了扶贫工作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指出扶贫首先要申通政府与贫困户之间的信息桥梁。莫光辉与凌晨(2016)认为将政府职能转变与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有效结合是解决精准扶贫工作实践问题的关键。陈升等(2016年)通过文献梳理,认为项目的精准、资金利用的准确有效、贫困户精确识别是影响扶贫绩效的重要因素。林文漫(2017)通过对海南精准扶贫项目绩效的评估,认为扶贫资金利用率、到户率,资金项目报账率、项目招投标率对项目产出和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影响明显。雷望红(2017)认为在扶贫政策制订中,要有效实施资源配置,政策要具体可行,要有对政策的评判指标,以更好的推进扶贫工作。孔龙(2017)指出良好的扶贫绩效,来自于政府和农户的双向用力,政府要拿出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农户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张晓佳等(2017)运用问卷调查评估了群众对政府扶贫工作的看法及评价,提出了改善建议。代蕊华与于璇(2017)通过调研指出了教育扶贫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由于教育对于脱贫来说不是一项立杆见影的工作,导致教育扶贫被忽略。鉴于对扶贫工作的长远考量,建议政府应转变思路、完善教育法制体系、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与人文关怀。

(2) 贫困影响因素研究。张全红(2010)运用回归方法,通过我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对比研究,指出资金投入的多少并不是影响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罗楚亮(2010)以冀、豫等多个省市的村户为对象进行数据调查,研究了贫困户家庭特征与贫困程度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家庭平均年龄较低、文化水平较高、就业状况良好、人员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家庭,更容易脱离目前的贫困状态。杜风莲,孙婧芳(2011)通过 Logit 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的基本经济情况、人口构成情况、人员受教育程度与贫困程度具有密切关系,调查还指出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更高。肖云与严荣(2012)从精准扶贫政策角度出发,调查农村贫困人口对帮扶政策的满意水平,发现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了解程度、扶贫过程的公平性以及家庭的相关特征对于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并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对策。王宏杰(2013)通过对湖北省贫困村进行数据调查分析,得出结论为,贫困户的年龄结构、信仰、收入等因素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呈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在扶贫中要关注孤寡老人、完善补贴政策、对扶贫政策宣传要加以重视等建议。章元等(2013)利用我国 5 省 7 年的农村调查数据研究,指出贫困主要包括慢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得出结论为:家庭人口数量越多致贫可能性越高;以农业种植也为主和土地较多的农户,暂时性贫困较高。罗文斌(2019)以武陵山农户为对象进行抽样



调查,对以旅游为精准扶贫项目的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为:农户自身能力素质对旅游满意度影响不明显,但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公开程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郭宁宁(2019)通过对7年连片贫困区的数据调查,认为经济发展状况、生产能力对精准扶贫效率的影响强度较高。

(3) 精准扶贫实践问题及对策研究。刘娟(2012)认为扶贫工作中存在贫困体系识别不精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一些已经脱贫的贫困县或贫困户,仍然占据扶贫资源。柯元与杨和明(2012)分析了脱贫工作的几种模式,指出开发式扶贫具有一定缺陷,指出要将开放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联动起来,以优化扶贫绩效。周爱萍(2013)通过对重庆市武陵山区的实地调研,认为贫困问题的解决仅靠政府主导是不够的,要加强各级各部门之间的联动配合。张笑芸与唐燕(2014)以四川省为例,指出扶贫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扶贫项目未惠及真正的贫困农户、扶贫工作的轻重不匀、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提出优化扶贫路径、创新管理与考核方式、各级政府简政放权等对策。邓维杰(2014)对四川省79名贫困县扶贫工作的负责人进行匿名调查,得出结论为:超过九成的扶贫工作负责人,对国家扶贫政策评价较高,但实际执行成果与绩效评价较低。林雪霏(2014)从扶贫政策执行视角出发,指出由于扶贫机制不完善导致扶贫错位,对贫困户未精准识别,使得国家的政策和扶贫项目未落实到实处,减缓了扶贫进程。唐丽霞等(2015)通过对扶贫工作开展机制的研究,提出扶贫工作虽然在不断完善,但仍存在乡村干部队伍建设滞后、贫困户指标未能动态管理等问题。李国治与朱晓芸(2016)认为目前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主要问题包括贫困户能动性较差、扶贫模式僵化、资金错位等问题,驻村干部工作绩效不高等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导致贫困户满意度较低。陈宏(2019)以4省扶贫数据为基础脱贫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指出精准扶贫的政策和效果要以高质量的扶贫绩效为导向和目标,指出多个地区的扶贫资源的投入具有强制性、被动性,并据此指出要创新扶贫举措,要根据不同的阶段调整与之相适应的扶贫举措。卜红双与王太明(2020)认为扶贫人才队伍建设存在认识、对接、组织管理、执行运作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要加强扶贫人才队伍建设,以此为扶贫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左停等(2020)指出扶贫工作存在地方排斥保护主义、扶贫识别标准适应性低、扶贫资源不对称等问题。魏后凯(2020)认为当前脱贫工作中存在贫困户自身能力素质低、参与积极性与能动性不高等问题。

(4) 扶贫满意度的研究。徐友浩(2004)通过对比中西方国家的政府绩效,找出目前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顾客满意度的角度对政府绩效加以评估。吴建南(2007)以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为基础,在适当调整的基础上,开发设计了我国政府的满意度测评模型。刘小珉(2016)通过2014年的民族区域的数据调查,利用路径分析法,从贫困户满意度角度出发,对扶贫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为当前扶贫绩效的满意度水平偏低。张琳(2017)通过对湘鄂渝黔民族地区贫困户调查,构建了五个潜变量的扶贫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路径系数与中介效应来测算区域间精准扶贫效益及分值排名,研究发现应改进精准管理来提升扶贫效益满意度。石靖、卢春天与张志坚(2018)对陕西省贫困户进行抽样调查收集数据,以回归模型对满意度及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为,驻村干部与贫困群众有良好的沟通,贫困户对扶贫政策了解程度越高,贫困户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就越好。张梓伦(2018)以曲阳县为例,构建曲阳县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体系。得出结论为,贫困户对扶贫工作的透明度、政策宣传、资金资源配置几项满意度较低。王志章(2019)以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户数据为基础,研究



了政策推广、政策落实对其满意度的影响,认为积极的扶贫政策营销对于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政策是否落实到位对满意度也具有正向影响。

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1) 研究主要内容和方法。经检索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扶贫工作都有大量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为扶贫工作给予了理论与现实层面上的有效指引。现阶段研究主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相关指标性概念的界定。学者们对于扶贫概念内涵、影响因素等基础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如扶贫政策实施、贫困户识别、有效帮扶、精准管理等概念都有厘清,这为后续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二是研究领域涵盖较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地理等多层面的关注,较深较全论证了造成贫困的深刻原因,并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研究路径上看,主要从政策满意度方面结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对我国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2) 存在问题。一是专门针对易地搬迁扶贫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相关研究多数集中于精准扶贫政策的总体评价研究,或是针对与贫困户自身直接相关的某些因素进行研究。专门针对凉山彝区易地搬迁扶贫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二是部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尚不能全面、科学地反映易地搬迁扶贫工作成效,有的综合评价方法在指标权重设置上还不甚合理,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操作性不还有待完善;三是相关研究均是在易地搬迁扶贫工作进行之前或同时开展的,在相关工作结束后,专门针对易地搬迁扶贫构建全面的、符合精准特性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尚没发现。

研究方法

本文以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作为田野调查地,主要采取以下方法来开展研究工作。

文献研究法:通过国家省州扶贫开发局官网、知网以及各类政府及学术网站收集满意度、精准扶贫等与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深入理解、精确识别,整体提升对易地搬迁精准扶贫工作的现状的认知。是本文主要应用的研究方法。

观察法:通过到彝区集中易地搬迁扶贫点实地调研,感知和利用一些辅助方式,有效分析、观察易地搬迁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理性认识梳理整理构建出初步的凉山彝区易地搬迁扶贫成效评价指标体系。

层次分析法(AHP):该方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提出。该方法主要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种目标方案进行比较,以确定最优的方案。由于易地搬迁扶贫满意度影响因素众多,运用层次分析法可以将影响易地搬迁扶贫满意度的各类因素进一步归类成各个组成要素,然后通过各组成要素之间的两两比较确定其相对重要性,进而确定易地搬迁扶贫满意度指标体系的重要性总排序。

专家咨询法:就易地搬迁扶贫工作中一些专业性强的问题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如扶贫移民局负责人、易地搬迁工作负责人、搬迁区驻村书记等相关工作领域专家进行专门和程序性的咨询调查,以对这些问题进行高层次、专业性的预测判断与评价,从完善指标体系的构建。



访谈法：本文通过对凉山彝区易地搬迁户的实地访谈，总结归纳出易地搬迁实施客体对政府政策落实、基层政府组织工作实施、帮扶措施有效性、帮扶成效满意度等各要素的关注点，进而力求构建出全面、有效的指标体系。

研究目的意义

1. 理论意义

现阶段，对于扶贫资金、扶贫项目、扶贫实施效果的单项研究较多，而对于易地搬迁整体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易地搬迁实施主体（政府）与实施客体（易地搬迁贫困户）视角对易地扶贫搬迁绩效评价进行研究，为国家重大易地搬迁扶贫的具体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 and 方向。另外，鉴于易地搬迁指标体系构建复杂，本文以层次分析法、满意度理论为支持，从主观体两个角度出发构建整体评价指标体系，试图对目前并不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补充，并为其他扶贫措施的跟踪评价研究提供借鉴。

2. 现实意义

(1) 在目前国家精准扶贫工作全面收官阶段，对易地搬迁作全方位的回顾梳理，有利于易地搬迁扶贫因阶段性政策出台、实施的对象的动态变化、执行主体侧重的任务各不相同、执行流程差异，而导致对彝区易地搬迁扶贫落实情况缺乏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对易地搬迁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丰富了相关研究。

(2) 有利于优化彝区在后续乡村振兴阶段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政策的及时反馈是科学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构建的易地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凉山彝区易地扶贫搬迁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以此帮助政策制定者发现相关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后续政策行优化调整。

(3) 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构建，有利于监督有关部门的履责情况，以实现向有关部门问责问效，保证易地搬迁地，后续发展政策落实的合规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等。

研究结果

1. 凉山彝区易地搬迁扶贫成效指标构建原则

凉山彝区易地搬迁扶贫成效指标构建要紧紧围绕，搬迁群众有可持续发展产业，有生态宜居的居住地，有良好的乡风文明环境、集中搬迁地基层组织治理有力有效、搬迁地群众收明显增加等几个方面，体现彝区地域特征，既要系统全面系统，又要特色鲜明，既要坚持科学性又要有可操作性，既要全面评价搬迁成绩，又要找到存在问题，既要针对短期现状又要考虑长远发展需要。在凉山彝区易地搬迁扶贫成效指标体系构建上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系统全面性原则。即评价指标体系应综合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精神维度等诸多方面的要素及其各要素之间协调性。根据精准脱贫或易地搬迁扶贫需要达到的目标，全面反映易地搬迁进程和成效等各个方面，准确揭示易地搬迁重点任务进展情况及整体工作实施效果。易地搬迁既是目标又是过程，因此，指标体系既要考虑乡实施过程的动态化特



点，又要有一定的弹性，在动态过程中可作适时调整，以便能灵活全面有效果地反映易地搬迁工作施成效。

(2) 科学有效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科学反映彝区易地搬迁工程的总目标及其要求，同时还应满足搬迁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内在联系。既要保证与所反映问题高度相关，又要确保指标含义明确，准确反映易地搬迁的性质和特点。各项指标应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能相互网补共同健全评价指标。

(3) 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满足普遍性评价要求的同时，还应兼顾民族地区的差异性，采取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相结合的方式，满足分级分类评价的要求。

(4) 体现凉山彝区特点。评价指标体系注重体现凉山彝区“一步跨千年”彝区群众思想文化特点，要发挥评价指标体系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既要充分体现易地搬迁建设的要求应立足当前，又要考虑长远；既与国家扶贫评价体系相对接，又充分体现凉山彝区特色。

2. 指标构建

(1) 产业好。良好的产业造血能力是实现易地搬迁群众，搬得来、稳得下、能发展的重点，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产业好是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是易地搬迁地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支撑。实现产业兴旺，要求加快推进农业生产和经营现代化，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现选取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反映农业现代化水平；以人均农业总产值反映农业发展水平；以养殖业及服务业产值比重、农副产品加工业产值比重和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反映农村产业结构变动。

(2) 生态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好的生活环境是搬迁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是扶贫发展的长远目标，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生态宜居，要求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农村垃圾和污水整治，美化村容村貌，强化生态系统修复和维护。因而选取自来水供给普及率、生活垃圾处理率、工业垃圾处理率、森林覆盖率、绿地覆盖率、健身器人均占有率、卫生厕所普及率等指标反映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环境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

(3) 生活好。让搬迁群众过上好生活是易地搬迁最终需要实现的目标。生活好是扶贫工作的核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让搬迁群众过上好日子，就是要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本文选取了居民恩格尔系数、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交通通信支出比重、每千农户拥有的乡镇卫生院的病床数、农村养老保险普及率等要素反映易地搬迁群众的生活情况。

(4) 乡风好。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是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增强农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进行乡风文明建设，要引导彝区易地搬迁群众对文明新风尚的认可、遵从，加强群众的就业培训，加大农村普法教育力度，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开发搬迁地特色文化产业。本文选用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农村教育发展水平；每万人口文化站馆数反映农村文化建设状况；农村社会治安满意度反映易地搬迁地民风民俗状况。

(5) 治理好。治理有效是易地搬迁地良好运行的基础，可为搬迁群众实现安居乐业、乡村社会保持和谐有序提供有力支撑。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重依靠基层组织建设，拥有受教育程度和政治素养较高的基层组织班子，加大村政村务公开力度，有效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是搬迁地实现良好治理的关键。本文选用村干部中党员比重、专科以上学历村干部比、搬迁地彝族群众识字率、政务公开满意度，来反映搬迁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情况。

以往的指标体系构建中多强调客观具体的指标体系建构，强调对已有成果的总结性考察，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村民人均收入情况等，或是从扶贫方式上考察，如：教育扶贫、医疗扶贫、产业扶贫等，更多的是在普遍层面上进行考察，并不强调就某一个特定地区、某一特定扶贫工作类型的研究。我们认为扶贫成效不仅是一些具体的硬件指标，更是一个主观性和主体性的概念，应该在客观指标的基础上，融合幸福感、获得感等主观性和主体性维度。同时扶贫成效研究也不应该一概而论，应针对特殊地区作定向研究。易地搬迁扶贫是凉山彝区扶贫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应有对其特殊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在总结脱贫攻坚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扶贫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振兴发展目标，融主客体性为一体，从产业、生态、生活、乡风、治理等 5 方面构建易地搬迁扶贫成效指标。

本文构建的易地搬迁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5 个一级指标、28 项二级指标，具体见表 1。

总目标	一级指标	符号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易地搬迁效果	产业好	A1	养养殖业产值占比	%	正向指标
		A2	农副产品加工产值占比	%	正向指标
		A3	农业机械化率	%	正向指标
		A4	非农产业劳动力占比	%	正向指标
		A5	人均农业产值	元/人	正向指标
	生态好	B1	自来水供给普及率	%	正向指标
		B2	生活垃圾处理率	%	正向指标
		B3	工业垃圾处理率	%	正向指标
		B4	森林覆盖率	%	正向指标
		B5	绿地覆盖率	%	正向指标
		B6	卫生厕所普及率	%	正向指标
		B7	健身器人均占有率	%	正向指标
	生活好	C1	人均可支配收	元/人	正向指标
		C2	搬迁户恩格尔系数	%	逆向指标
		C3	交通通信支出比重	%	正向指标
		C4	每千人卫生所（院）病床数	张	正向指标
		C5	农村养老保障普及率	%	正向指标
	乡风好	D1	人均接受教育年限	年	正向指标
		D2	每万人文化站馆数	个	正向指标
		D3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	%	正向指标
		D4	社区宣传栏个数	个	正向指标
		D5	移风移俗教育	次	正向指标
		D6	社会治安满意度	%	正向指标
		D7	邻里是否有打架斗殴情况	次	逆向指标
	治理好	E1	搬迁社区中党员比重	%	正向指标
		E2	专科以上学历干部比重	%	正向指标
		E3	搬迁社区村务公开满意度	%	正向指标
		E4	是否有成体系的管理体系	个	正向指标



结语

精准扶贫工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明确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同时客观反映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成效和问题短板，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工作成效虽然是主观感受指标，但是从搬迁地社区治理的角度研究搬迁群众满意度和易地扶贫搬迁建设成效，不仅应包括搬迁地基础设施、基础性环境建设性情况，还应包括乡风文明、服务支持、管理制度指标等主观感受指标。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地建设，不仅要实现从上到下的管理，更应该实现从下到上的参与，将搬迁地管理和搬迁群众体验相结合，突出扶贫搬迁客体即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将社区成一个生态系统，在生态理论指导下，结合需求层次理论，将易地扶贫搬迁地考评机制上下结合。客观上看，凉山彝区易地搬迁扶贫实施效果的评估离不开贫困户的参与，只有贫困户满意了，精准扶贫政策才算真正落到了实处，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如果贫困户满意度低则说明脱贫攻坚工作还有较大改善的余地。因此，本文在现有扶贫成效普遍性、客观性指标构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针对民族地区主要的易地扶贫搬迁模式、融合主客体性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试图从产业、生态、生活、乡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5个方面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效果评价体系。良好的易地扶贫搬迁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对反映易地扶贫搬迁战略实施成效，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有效衔接，做好民族地区后一步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具体评价过程中，还要注意：一是需要从搬迁对象个体特征、政府政策、执行者素质、搬迁群众社会参与度等角度思考，进一步在二级指标体系的基础，对精准扶贫绩效的影响进一步梳理完善细化三级指标体系。二是要尽量实现智慧化管理。通过智慧社区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年底评价报告，作为评价的基本依据。在此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及暗访，完成最终评价。三是要多方征求意见，增强评价的合理性。在田野调查，征询居民、社区管理人员、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设定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评价主体可以包括由搬迁居民、搬迁社区单位组成自我评价小组，还有由上级机关、专家、第三方评价机构等组成评审小组。评价指标的设定坚持系统性、科学性、综合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可量化、动态开放性原则，着眼完善易地搬迁地治理体系、增强搬迁社区管理能力、提升搬迁社区服务水平。四是在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上，要坚持以事实、坚持评价小组评价与群众满意率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独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评分表、群众满意率问卷调查表、“易地扶贫搬迁地”社区自我评价表、“易地扶贫搬迁地”评审小组评价表等，以进一步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效果评价。

References

- 卜红双、王太明. (2020). 扶贫工作队人力资源开发困境、成因及路径——以精准扶贫为视域.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2(01), 97-104.
- 曹军会、何得桂、朱玉春. (2017).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7(04), 16-23.
- 常艳. (2008). 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土地安置能力分析. *经济问题探索*, (6), 155-158.
- 程瑜. (2006). *白村生活广东三峡移民适应性的人类学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何得桂、党国英.(2015).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06), 119-123.
- 李小云.(2001). *参与式发展概论: 理论·方法·工具*.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 林友苏.(1987).人口迁移理论简介. *人口研究*, (2), 55-58.
- 刘小珉.(2016).农户满意度视角的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绩效评价研究——基于 2014 年民族地区大调查数据的分析. *民族研究*, (02), 29-41.
- 彭豪祥、张国兵、谭平. (2010). 三峡工程移民满意度与心理健康及其关联因素分析. *三峡论坛*, (3), 43-47.
- 司静波、黄岩、赵志兴. (2018). “精准时代”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偏差与纠偏路径. *农业经济与管理*, (02), 5-9.
- 王永平、袁家榆、曾凡、勤陈妮. (2008). 欠发达地区易地搬迁扶贫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探讨——从贵州扶贫主题调研引发的思考. *特区经济*, (1), 208-210.
- 魏娜.(2003).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 135-140.
- 邢成举.(2016).搬迁扶贫与移民生计重塑: 陕省证据. *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 (11), 65-73.
- 徐锡广、申鹏.(2018).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1), 103-110.
- 叶青、苏海. (2016).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 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10), 64-70.
- 张世勇.(2017).规划性社会变迁、执行压力与扶贫风险——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析.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3), 20-25.
- 张梓伦.(2018). *曲阳县贫困户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农业大学.
- 周恩宇、卯丹.(2017).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4 (02), 69-77.
- 左停.(2020).脱贫攻坚决胜期贫困治理的新问题与新对策. *国家治理*, (01), 29-33.
- Akerlof, & George, A.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3), 488-500.
- Anderson, E. W., & Sullivan, M. W. (1993).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for Firms. *Marketing Science*, 12(2), 125-143.
- Chen, H. P. (2006). The Conversion of Government Role and Participation Mod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Gannan Teachers College*, (1), 26.
- Colin, T., & Lin, L. (2003). The Impact of Research-Le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World Development*, 31(21), 1959-1975.
- Craig, V., Van, S., & Mukesh, S. (2012). Poverty Alleviation Partnerships: A Road Less Travelled for Business, Governments, and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0(3), 321-332.
- Mahabub, H. (1988). *Credit for Alleviation of Rural Poverty: The Grameen Bank in Bangladesh*.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Marco, T. (2013). Before Microfinance: The Social Value of Microsavings in Vincentian Poverty Redu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2(4), 697-706.



- Oliver, R. L., & Swan, J. E. (1989). Equity and Disconfirmation Perceptions as Influences on Merchant and Product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6(3), 372-383.
- Per, P. A., & Rajul, P. L. (1995). *Agricultural Growth Is the Key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Ravenstein, E. G. (1889). The law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52(2), 167-235, 241-305.
- Yang, J. (2006). Research into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of Using Whole Villages Resources to Develop.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West Forum)*, (6), 4.